

访美观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 著



访美观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访 美 观 感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日报印刷厂排版
房山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 1/4印张 73千字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0 册

统一书号: 3190·010 定价: 0.34元

内 部 发 行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目的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科学界的友谊及相互了解，探索中美两国社会科学方面学术交流的途径。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三十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代表团受到美国各学术机构和各方面学者的热情接待，团员还各按不同学科和美国各地有关学者座谈、交流情况。中美两国学术交流正在逐步开展，为向我国社会科学界汇报这次访美情况和印象，现将代表团团长宦乡、副团长宋一平和部分团员所写的文章辑集成册，其中舛误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

目 次

前 言

访问美国情况报告	宦 乡 宋一平 (1)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费孝通 (34)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简况	钱锺书 (50)
美国法学界情况	芮 沐 (56)
重访美国	薛葆鼎 (64)
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简况	李 新 (76)
从宗教的窗口看美国	赵复三 (81)
美国的语言学研究	廖秋忠 (93)

访问美国情况报告

宦 乡 宋一平

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一行十人，包括工业经济、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语言学、情报科学、宗教学等方面科研工作者，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到五月十六日访问了美国，目的是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科学界的友谊及相互了解，探索中美社会科学方面学术交流的途径。这是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第一个访美代表团，美方对我们代表团态度友好、热情，日程安排及接待工作十分细致周到。

代表团访问了华盛顿、纽约、匹茨堡、纽黑文、波士顿、安阿伯、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火奴鲁鲁等地大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华盛顿时，访问了白宫、布鲁金斯学会、司密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在洛杉矶时，访问了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包大可(塞克·巴奈特)在欢迎代表团致词中说，中国社会科学家三十年来第一次与该学会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在华盛顿期间，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助理迈可·奥克森伯格除参加安排代表团访问白宫日程、出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欢迎宴会外，还在赴东京参加三边委员会启程前几小时来旅馆，和我们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表示：美中两国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两国相互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社会科学交流，代表团此次访美是这方面的重要开端，希望中美两国关系与学术交流方面都得

到发展。代表团访问白宫、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处时，主人介绍美国情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很实事求是。布鲁金斯学会及威尔逊中心等还表示欢迎中国学者到美国，共同研究国际问题。代表团所到各大学、各研究机构都希望与我国学者交换访问，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在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同行、大学生或者各阶层人民都十分友好，充分体现出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尤其使我们深受感动的是在美国的华侨和华人学者，对代表团热情款待，关心祖国的现代化、民主化，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渴望为此贡献力量。我们在一起，常常谈到深夜还舍不得分开。

代表团结束访美前，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几位重要负责人由华盛顿专程飞往旧金山，与我们讨论今后中美社会科学学术交流问题，并准备在今秋明春，陆续派人来我国，继续讨论，希望达成短期和长期的学术交流协议。

短短一个月的访问，虽然只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却使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友好热情和积极进取、实事求是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当前美国的情况也获得一点粗浅的了解。中美两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现在刚刚开始，相信今后的交流活动对两国人民沟通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两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能有所贡献。下面主要谈我们访问美国的印象和一些感想。

一、当前美国情况

（一）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关心苏联扩张主义野心与国际关系的发展

我们访美期间，正值美国国会将就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定进行辩论。一些国际问题学者同我们谈论，认为近年来，

苏联在宣传中极力炫耀它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还引人注目地鼓吹“进攻性战略”；苏联的军事理论虽不一定能表明苏联未来的行动，但决不能等闲看待。目前，苏联军事生产投资比美国多百分之七十五。过去，美国有关方面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军事部分估算过低，现在认为这个数字应当增加一倍，才符合实际情况。八十年代，苏联经济增长率将降低到百分之三或更低，但是，看来，苏联不会压缩军事开支，可能只是控制军事开支的增长。美国的一部分国际问题学者对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深感不安。

反过来看，美国如何应付，在政策思想上是混乱的。据美国学者们介绍，美国政府内外有三派主张。一派认为，处在核武器时代，美苏都不想打大仗，但军备竞赛使双方都惧怕对方先发制人，因此主张控制军备竞赛。一派认为，由于核战争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美苏间有爆发战争可能，主张美国积极增强作战能力。还有一派认为，当前的发展趋势是美国的力量在走下坡路，美国的盟国感到今后只能各自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这样一来，美国与盟国及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将日趋紧张，又进一步削弱美国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力量。于是，这一派人主张美国应以“世界政治影响”作为首要考虑。美国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内外的争论将继续下去，国家领导人则将在各派中间谋求妥协。归根到底，持这三种意见的人，谁也说不出口，如何能说服苏联放慢军备竞赛。

一些美国学者还认为，近年来，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增强了，相互间的纠纷和冲突加多了，而西方国家干涉各国事务的能力则大大削弱了。当前，苏联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军事上，从常规武器的总情况看，比美国稍强；但在经济实力上，苏联比美国弱得多。因此，目前苏联还不会与美国破裂对抗，一则美国还强大，二则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宣扬和平共处，对苏联有利，可

以在不刺激美国的情况下，把美国科学技术拿过去；同时，分化美国和西欧、日本的联系，削弱北大西洋公约国家的力量。

应该说，这些美国学者的看法还是比较清醒的。

（二）经济学家为美国经济“滞胀”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感到忧虑，拿不出有效解决办法

我们代表团此次在美粗浅印象，深感美国自然条件优越，可耕面积和煤炭资源等远未充分利用，但由于资本集约、技术集约的缘故，劳动生产率是很高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尔特·罗斯托根据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美国早已越过“技术成熟阶段”，现代技术已有效应用于大部分资源，现在“工业主导部门可以转移到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方面”，进入“群众高消费的阶段”。据美国学者介绍，美国农业生产现已全面企业化，选种、播种等都有专业公司，农业经营者在生产季节中分阶段雇专业公司包工包产。加上农业技术不断改进，机械化程度很高，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率显著增长，农业劳动力显著减少，一个农业人员能养活六十余人之多。在有的地区，如纽约至波士顿、芝加哥至克利夫兰、洛杉矶至圣地亚哥，城市发展已连结成片，城乡差别不大。在工业中，钢铁、电子、石油化工、建筑、汽车五大工业仍是工业经济五大支柱。电力、电讯、航空、公路交通事业三十年来有极大发展。在我们所到的北方各城市，工业污染问题似乎解决得不错。但据知，美国长期以来对工业三废随意处置，现在环境污染依然还是严重问题。全国每年有九百二十亿磅有害废物需要处理，居民饮水中毒，不时发现。从长期看，下水道污染是严重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在某些地区，二三十年后干净水源都将成为问题。

三十年来美国工业有很大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1、美国有不少老的工厂，现在厂房仍在，但内部机械设备都已多次更新。这样，厂房设备，四周的辅助行业以及服务事业均得以继续充分利用，工厂社区的社会关系保存下来了。这些对于生产发展和工人生活都有极大好处。

2、美国除大工厂外，也有不少小厂，彼此配合，并与大厂协作。如波士顿市郊，生产电子计算机元件的小厂就有近五百家。这些小厂与我国小厂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不同，而是运用尖端技术，专门生产某些重要零部件；它们全靠竞争来生存，进取精神强，技术上不保守，厂小而且专门化，便于管理。这些小厂与大厂连结一起，构成整个工业体系（不过小厂搞好后，有的也为大厂所兼并）。

3、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使工厂领导对全部生产流程了如指掌。出了故障，毛病在哪里，如何调节，随时可以掌握，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在每个工厂、大公司、跨国公司内部，计划性是很强的。

4、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一项大的任务以阿波罗登月计划为例，可被分解为几万甚至十几万个小题目，能够组织动员四十余万人分头进行几年，然后再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把几十万个数据综合起来。这样组织、分工、协调管理，效率极高。这种方法构成一门新的学科：称为“系统工程学”，正在日益广泛地加以运用。

从近十年美国电子技术及科技各部门发展看，美国工业生产力发展余地似还很大，美国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近年来，美国南部“阳光地带”十几个州的工业迅速发展便足以说明。

但是，从整体看，美国资本主义的病根很深，难以根治。在代表团访问白宫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兹承认。美国经济当前面临许多困难，其中主要是：

1、通货膨胀。十年来每年平均率约达百分之六点五，今年

第一季度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五。

2、能源危机。每年全国消耗九亿吨石油约半数来自国外。伊朗政局变动，石油输出国抬高油价，对美国影响很大。

3、生产增长率下降。去年第四季度生产增长率达百分之七，今年第一季度为百分之一。按过去经验，生产增长率达到一个高峰并不难，但要长期保持却极难。现在美国只能维持低水平（百分之二点三）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落后于西德、日本。

4、失业贫穷问题。近十年来，失业人口一直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按“新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托宾的理论，失业人口应经常维持在百分之四的水平），贫穷、营养不良居民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十。

舒尔兹承认，美国经济全靠市场经济调节已经不行，现在需要用计划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这些问题已成为美国人民普遍忧虑的问题。代表团访美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在被调查的千余人之中，认为美国陷入严重困难的，从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一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认为美国面临问题并不严重的，从一年前百分之五十一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一。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通货膨胀，而且认为政府已无力加以控制。经济前景黯淡，以致人们历来焦虑的社会犯罪问题也相形见绌，无暇顾及了。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将近半数人回答说要动用过去的储蓄来补贴日常开支；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要兼做另一份职业来维持家庭生活；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男子要让妻子出去工作，才能维持全家开支。而人们对失业的恐惧，甚至更超过对通货膨胀的焦虑。

当前，美国能源危机十分突出。代表团在美期间，加利福尼亚州（据称，汽车数字占全美十分之一）汽油供应紧张，周末假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加油站停止营业。私人汽车为加油排成长龙，

有的从早等到晚，有的半夜前往排队。卡特提出全国节油法案，遭到国会否决。一般群众认为石油危机大部分是石油公司人为造成的，以便涨价。但随后石油危机由加利福尼亚州逐渐蔓延到其他各州，群众看到石油危机确实严重，又越发感到焦虑。这成为电视台每天的重要新闻。公众对总统日益不满，主要原因是认为他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随着总统威信的下落，公众的悲观情绪在上升。有些人还认为，即使换一个总统也无济于事。美国人素来认为乐观自信是美国人天生的气质，而现在，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已经消逝得不知去向。

有的美国学者回忆起，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两位经济学家亨利·亚当姆斯和威廉·格雷汉·苏姆纳就曾经发出过警告。亚当姆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将加快石油资源的枯竭。苏姆纳则警告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特有的政治民主”——没有十分尖锐的阶级冲突和阶级压迫——只有在自然资源价格低廉，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追求利润而生产，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要鼓励消费，鼓励消费者从满足生活需要扩展到追求舒适享受。因此，大量浪费各种自然资源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特征。另一方面，美国为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必须更新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这又必然要造成劳动力过剩和失业的增长。从理论上说，美国政府可以运用货币、信贷、投资、税收、补贴、限制物价、培训低级技术人员等多种方式控制经济发展。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困难很多。美国政府如果要控制不断上涨的物价，就要损害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垄断资本家决不答应。美国联邦储备局想要提高贷款利率，紧缩信贷，又怕加深经济衰退；如果维持目前贷款利率，放宽信贷，则通货膨胀趋势将会更加恶化。这是美国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

美国总统科学事务首席顾问普雷斯则认为，美国科技发展，近年来因经费减少关系，没有多少起色；政府准备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增加这方面的开支，以保持美国在科技方面的世界地位，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对于资本家是否会跟着政府进行投资，则说不上来。

在布鲁金斯学会欢迎我们代表团的午餐会上，经济学家劳伦斯·克劳斯就《世界经济展望》发表演讲，认为今后一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容乐观，通货膨胀将成为世界现象，石油价格可能上涨百分之三十三，制成品价格将上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各国政府将不得不控制贸易，实行保护政策与新的货币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前景发展缓慢。在上述各种因素影响下，美国已进入经济停滞时期，今后要进行经济调整。

欧洲各国对世界经济趋势的反应比美国快。西德对通货膨胀正加紧控制，预测一九八〇年西德经济发展也将转缓。日本经济还有发展潜力，但世界经济进入停滞，势必也会影响到日本。不产油国家将因油价上涨而陷于困境，有的要靠贷款维持，影响收支平衡；有的紧缩石油消费量，又将影响经济发展，总之，收支状况都将恶化。

石油生产输出国家因油价上涨，去年增加一百亿美元收入，共有二百五十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盈余。从一九七七年情况看，国际金融市场有能力吸收，但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本身动荡，也会给石油输出国家带来困难。

美国受石油危机的波及影响最大。过去从伊朗进口石油，向伊朗输出商品，由于伊朗政局变动，受沉重打击。今后一年美国收支情况不会顺利。美国还不得不继续向外国提供贷款，而这又将限制美国支付能力，不利于美国从经济衰退中摆脱出来。西欧日本也受石油涨价影响，但由于国际收支有盈余，所以还能应付。

从长远影响看，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九年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调整本国经济。其他不产油的工业发达国家有能力较快调整经济，美国则由于上述原因，“滞胀”还将持续一些年。今后，在高收入的地区和国家中，较低水平的台湾、南朝鲜可能与意大利、新西兰接近。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巴布亚等将很快发展，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将日益重要，不亚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估计不会十分严重，但将持续下去。如果美国对它忽视，不采取措施，则将造成世界性经济危机。另一种可能是，由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与美国一道，共同运用国际货币基金，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工具来进行调节，但条件是要给它们以否决权。美国目前的两难处境是：若不愿眼看世界经济遭到破坏，就要接受其他国家的制约。当年，英国在大英帝国内也曾面临这样的局面。

现在，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普遍的看法是：难以预测。

（三）政府机构中行政官员与社会科学专家和教授的结合

访美期间，我们不时听到抱怨政府官僚体制。据了解，七十年代初材料，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二百七十万人，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雇员近一千万人。在美国两亿二千万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大。政府雇员增多是政府军事开支越来越大，干预经济生活越来越多，社会福利担子越来越重，法令条例越来越繁琐的必然结果。

但是，美国政府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政府机关中吸收大量经济、法律、外国问题专家等参加工作。这固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收买知识分子的手段，但是，行政机关的效能却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政府机关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

关系十分密切，这是二次大战以后近四十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战争需要，把数学、统计、经济学、历史学、语言训练、行政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各部门、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全部动员组织起来，分析战争形势，研究内外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认真地把社会科学应用在当前的实际生活中去，形成教学——研究——从政三者密切结合并相互转业的制度，其最早的组织形式便是起初由空军建立的兰德公司（现在，自称是独立的研究组织）。以后逐渐推广这种做法。五十年代起，政府开始大量介入社会科学研究，与研究机构订立合同，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把兰德公司的专家们吸收到国防部、预算局。由于这样做取得成就，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政府又把这种做法推广到政府各部门制订政策程序中去，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辅佐制订政策的重要工具。具体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吸收各种专家学者到政府机构中工作。第二种形式是政府各部门从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聘请一批有专门学识的教授担任顾问，对各方面专门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种形式是政府各部门把各种问题委托给大学、科研机构去研究，由政府拨给研究经费。例如政府的税收、失业救济、老年福利、医药保健、购房贷款等各种条例，经济效果如何，都委托大学和科研机关作典型调查，并利用社会学、统计学的“模式选样”，计算“费用与收益”，研究如何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经济效果，可以设计几种方案，供政府行政部门选择。这样，政府利用了全国社会科学力量为政府服务，却不占政府的编制和行政预算。政府认识到，每一项政策都有自己的“日落规律”，它的有效作用不是无限期的，因此需要不断研究情况的变化，据以制订新的政策。美国国会规定，制订实施每项政策所需花费的资金中，要提出百分之一作为研究该项政策之用。现在联邦政府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度经费约为七

亿美元。美国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究经费中百分之二十来自政府合同。此外，政府还拨款设立社会科学、人文学基金，专事培训各种专门人材。这样，便保证了大量专家为政府各部门服务。

对美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我们没有专门进行了解，从此次收集的材料看，议员对于国会通过的各种法案往往缺乏专门知识，只不过是政党、大企业等势力操纵影响下行事而已。过去国会各委员会主席拥有很大权力，最近，在各委员会下增设小组委员会，以缩小委员会主席权力。本届美国国会众议院里就有二十九个常设委员会，一百五十一个小组委员会；参议院有二十一个委员会，一百一十二个小组委员会（参议院议员才一百人）。此外，还有两院议员组成的四个联合委员会，七个联合小组委员会。民主党、共和党在众参两院还有各自的党派委员会共十三个。平均每个众议员要参加三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参议员要参加五个小组委员会。议员们陷在会议之中，于是需要大量助理人员，现在，议员及国会各委员会的专职助理人员达五千人，并设有专门为议员和他们的助理人员服务的国会图书馆，其中研究部就配备有专职研究工作人员八百五十人。这些助理人员拥有巨大的幕后影响，如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的防务问题顾问理查德·泼尔被认为是参议院讨论军备控制问题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助理人员为议员准备各种提交国会的提案。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度，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两万二千三百一十三项提案，众议院对其中一千八百一十项听取了专题报告，参议院听取了一千四百一十三项专门报告。最后，国会通过了三千二百一十一项法案和决议，为其中八百零四项法案还制订了法律。仅一九七八年“修订一九五四年税法的法案”便长达一百八十四页，这还只是修订一项旧法案。此外，在过去两年内，国会还要批准十二万四千七百三十项总统提交的人事任命。对国会议员施加影响的，除政党外，还有各企

业、商会、工会等团体派驻华盛顿的院外集团，总数近一万五千人。这些院外游说人员每年花费二十亿美元，影响议员。他们的专业知识甚至凌驾国会助理人员之上。在两院表决某项法案时，议员们甚至看着楼上环廊的院外游说专家的手势来表态，大拇指朝上就投赞成票，大拇指朝下就投反对票。

一般选民对议员选举日益不感兴趣。一九七〇年议员选举时，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五选民参加投票，而在选举本届国会议员时，只有百分之三十七点九选民参加投票。

美国报刊指出，国会议员都深知目前国会制度的弊窦，但看不出有改革的希望，因为议员的个人利益与现行国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有谁愿意翻倒这辆苹果车呢？”

（四）社会问题很多，精神文化腐朽没落

美国物质产品的确十分丰富，一般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美国政府承认的贫穷人口比例为百分之十，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实际不止此数。）但是，正如加州大学贝拉教授所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可能发展，物质福利可以增长，社会问题却难以解决。我们比祖辈富裕五到十倍，但是，并不因此就快乐五到十倍。”美国社会问题很多，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1、种族歧视问题。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制订了法律，禁止种族歧视，对有的机关学校还规定录用、录取一定比例有色人种的雇员和学生。从表面看，现在种族歧视问题比以前有所缓和。但从失业人口比例看，全国失业人口比率为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而黑人的失业人口比率为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黑人人口约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从社会看，传统上把“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新教徒”看作典型美国人，现在虽有一部分黑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挤进上层社会，但我们所经北

方各大城市，旅馆、饭店服务员、机场车站搬运夫、汽车加油站修理工等有很多是黑人。这些大城市的白人资产阶级纷纷迁往郊区居住，黑种穷人则住在市区旧公寓里，市政设施、房屋维修都很差。据说，在南方，黑人处境更坏，因此，许多黑人流往北方。看来，美国黑人问题并未解决，而是向深化发展，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结合。目前，美国黑人没有组织，也没有社会领袖，统治集团把主张非暴力主义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已被暗杀)树成黑人偶像，在黑人中还有很大影响。黑人运动目前还起不来。

2、青少年堕落犯罪问题。我们在洛杉矶时，电视台报道，一个十四岁青年用刀刺伤一个九十一岁老妇人，抢走存款簿，并说这类案件全国一年多达二百五十万起。除暴力犯罪外，性的放纵成风。二十岁以下年轻母亲成一个社会问题。新泽西州议会最近正讨论制订法律，准备承认十三岁以上女青年怀孕生育为合法。青少年吃“迷幻药”十分流行，电视台报道，全国有一千余万。

3、学校教育问题。过去，美国资产阶级把公立学校引为骄傲，认为从欧洲移居美国的各民族后裔，经过学校的熔炉，都化成同一的美国人。教育被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而现在，各州政府财政困难，削减公立学校经费，学校设备和教师质量下降，有些学校经费用罄便短期停课。有钱人家子女多半上私立学校；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有色人种的子女则多半上公立学校。有色人种青年自幼所受的就是次等教育，因此升大学也往往竞争不过白人资产阶级子女，只能从事“下等职业”。美国法律规定十年义务教育(六岁至十六岁)，强制执行，实际是为培训穷人充当工人。中小学教育成为巩固白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很大，全国有两千五百所大学；但真正水平高的并不多。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商业化。助理教授、副教授要为升到正教授而拼命写书，正教授要为谋得长期聘约而

拚命写书，形成教授中间的一句成语：“若不出书，就要灭亡”

(Publish or Perish)。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还要看他能从政府或基金会兜揽来多少科研项目。这种科研课题都由政府或基金会拨给经费，大学当局从中提取三至五成。因此，教授能为大学充当摇钱树，招徕学生或揽来科研项目，在大学里就有地位；不然，就要被淘汰。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也不断增长。今年，有些大学对一年级新生收费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二十。由于费用上涨，学生人数下降。本学年学生人数不到一千一百四十万人，比上学年有所减少。由于学生学费在大学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各大学都处于费用迅速增长、收入急剧减少的困难之中。一些老牌的著名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现在都感到经济拮据，有的解聘教授、削减员工，有的取消科研计划，有的推迟宿舍等新建筑。一般青年读大学，目的是为了谋求职业，把读书看作一种投资。近年来，各州设立不少公立学院 (Community College)，学制比正式大学缩短两年，主要搞职业训练，两年毕业后即可就业。青年趋之若鹜。纽约州公立学院学生多达六万人，比纽约州立大学学生多三万人。这是商业社会要求“投资少，产品多”的原则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有些大学中的老教授感叹，近年来，大学的学术水平一般有所下降。

4、精神文化腐朽。我们曾问一位大学教授，美国一般人最关切的心愿是什么？回答是“个人得到成功”。“成功”的含义则是：“第一，赚钱多、费劲少的职业；第二，职位不断提升、出名；第三，漂亮的住宅和新汽车。”和一位住在美国四十年的华人电子计算机专家谈到美国人的生哲学，他说：“美国人一般对人友善，但这也是他们的处世之道。真正代表美国商业社会的生哲学是认为：人人都是坏蛋，你我都一样。谁都想偷税漏税、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甚至

干伤天害理的事。因此，只能靠法律严加防范约束。聪明人就是干了坏事而又不被别人抓住。既然人人都是如此，每人都要提防别人，与其让别人来吃我，不如我先吃掉他。”我们曾问一些大学教授，在美国社会里，把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理想是什么？回答是：没有。国家从老百姓头上抽税，几届政府进行越南战争，还欺骗老百姓；尼克松搞了“水门事件”，是个道德破产的政客。因此，爱国主义口号在通常情况下并不能打动人心。任何政党或总统也没有对国家经济发展提出过什么长远规划，只是混过一年算一年。一般人都是谋求个人私利，因此谈不到共同的远景理想，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美国人的口头语是“感谢上帝，又熬到了星期五”（星期六、日休假）。劳动纯粹是为了谋生。在家庭关系中，夫妻、父子间的感情建立在金钱上，关系十分淡薄。社会的这个基本组织纽带也在松弛。因此，尽管物质生活富裕，人们却感到孤独。不少人认为生活没有意义，于是到酒吧间跳舞、酗酒、驾车游乐，寻求色情、暴力刺激。传统的基督教会已不能用来世天堂、伦理道德说教维系人心，因此几十种新兴教派（在圭亚那琼斯敦教集体自杀的“人民圣殿”教只是其中之一）和各种东方宗教十分活跃。信徒人数虽然有限，社会影响却不小。

总起来看，美国经济虽已陷入困境，但似乎还有回旋余地，而精神文化则已走上腐化没落道路。

二、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些情况

我们访美期间深切感到：在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却最不发达，甚至没有像西欧日本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六十年代晚期，美国曾经出现所谓“新左翼”运动，但与工人运动却毫无联系。这个现象需要认真

研究。

当前美国社会科学主要是反映美国垄断资本统治的困境与需要。美国当前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如何解救美国的经济衰退和它的社会问题、文化危机；二是在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如何取胜。这两个问题都联系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前途如何。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主要学科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围绕垄断资本统治的需要而展开的。

以下，先约略谈一下我们所见到的几个学科的思潮，由于我们在美国的时间不长，见闻有限，所谈看法肯定是浅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是作为问题提出来，以便今后能进一步认真研究。

（一）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美国哲学界最流行的派别是实用主义。直到今日，它的影响渗透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的核心论点是：思维就是从怀疑状态到信仰状态的过渡。而信仰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基于信仰的活动取得多大成果。这就否定了认识论的反映论，否定实践证明真理，而认为主观意志、主观的暂时的有用性（他们称之为“实践”）便是真理，由此强调实践具有绝对性质。詹姆斯更进一步主张必须摒弃意识概念，而用“经验的实在”来代替。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论的意义。

据美国学者介绍，当前美国学院派哲学走进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分析学的死胡同。按照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来澄清基本概念，寻找问题和论断的意义，并把意义搞清楚。因此，认为哲学不是要建立理论体系，而是澄清语言的活动。这种主张导致语义分析，认为一切哲学问题实际上都是语义、句法问题。这样的哲学与社会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在

美国不少大学的哲学系课程集中在认识论和逻辑上，把传统的哲学科目如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都忽略了，结果门庭冷落（大学各系兴衰以是否有利于找到待遇优厚的职业为转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理学院，历史系有六、七十名教师，哲学系只有十几名教授。

从我们所接触的知识界思想状况，主要是实用主义思潮影响，而在实用主义掩盖之下，是一种庸俗化的存在主义思潮。处在高度商业化社会之中，加上近十年来美国的急剧没落，知识分子中的有识之士对自身成为商品，既厌恶又感到无可奈何，对资本主义前途则感到渺茫、恐惧。而这却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主题。它鼓吹“作为社会的我并不是我自己”（所谓“异化”），对社会抱极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态度，反对个人的社会责任，否定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思想在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相当流行。它在六十年代被称为“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由于得不到正确社会发展理论的引导，一部分便蜕化为性的极度放纵。现在，“反文化”运动逐渐取得社会公认地位，甚至淫书淫画发展成为庞大的赚钱行业，每月销售一千多万份。各大学里还有同性恋者协会，在社会上同性恋者争取“解放”，自称为“人权”运动的不可缺少部分。美国自立国以来，标榜基督教清教徒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现在都在动荡之中，形成今日美国思想界普遍谈论的所谓“价值危机”。

（二）社会学及人类学

社会学及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分立的学科。前者除研究一般的社会理论外，主要是研究美国的社会问题；人类学包括对美洲的印第安人及其他地区不发达民族的考古、语言、体质、社会及文化等各方面的研究。近三十年来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

象已逐步向美国人的社会生活推广，如已有所谓城市人类学、医疗人类学等，而且人类学者已参予现代城市规划的工程设计等研究工作，因而它和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已经重叠。这两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社会学着重就特定的社会问题用问答表格进行选择调查，反映较广大的社区某一方面的基本情况，而文化（社会）人类学则着重由研究者亲身参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方面综合的观察和体会，反映较狭小的社区全面的基本情况。这两门学科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所以有些大学已将这两门学科合并在一个学系。

在美国，近三十年来这两门学科是比较发达的，美国的大学大多设立这些学系，有三百八十六个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系教师超过四千六百人，社会系教师更多，社会系研究院的教师即有四千九百人。这两门学科在大学里的基本课程实际上是一些关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那些设有研究院的所谓大学也是以培养大学教师为主。只有少数社会学者与人类学者从事于理论的研究。

从理论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社会学及社会人类学都跟随欧洲大陆的风气，亦步亦趋。四十和五十年代占重要地位的理论是通过英国传入的法国 Durkheim 和 Mauss 的社会功能论。六十年代又流入了法国 Levy-Strauss 的社会结构论，风靡一时。在这些理论基础上，七十年代发展了社会象征论，企图用语言及思想的逻辑形式所反映出来的意识上存在的基本模式，来解释社会的基本结构。这是和哲学里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分析学等属于同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潮。

但必须指出，这些理论研究并不是当前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主流。这两门学科和美国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在理论上是贫乏的，社会学里自从哈佛大学 Parsons 教授退休以后再也没有

人企图对社会现象提出全面的系统理论了，甚至认为这是徒劳无功的。当前在这两门学科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应用社会学和应用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及一些大企业已认识到社会科学对决定政策及检查政策的效果都有用处，因而向社会学者提出许多研究任务，于是产生了许多承包研究任务的“知识企业”，兰德公司即是一个例子，它所承包的检查贫民医疗公助计划效果的研究计划就是属于社会学的范围。

这些研究工作着重在资料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由于大量利用电子设备，在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发展，对社会变动的短期预测也是有成绩的。同时由于政府及大企业所提出要求解决的问题常常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研究工作也必须有多种学科的协作，社会学及社会人类学经常被组织在这类多科性的研究如城市规划、社会立法等研究计划之中。但是由于这类以解决具体问题为目的的研究计划吸引了这些学科中许多有能力的研究工作者，理论研究的队伍相应地被削弱了，这也是当前美国社会学及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理论上显得贫乏的一个原因。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继续下去。

近年来，在理论上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代表马尔库塞。他把加尔布雷思提出的“富裕社会”作了进一步的“注释”，认为其典型标志是：1、工业技术力量的高度发达，其大部分被用来生产高级消费品、奢侈品和用到军事、半军事方面，即用于“非生产事业”和服务行业方面；2、生活水平提高，甚至连非特权阶级也可分享到一份好处；3、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组织干预，更促进了这一集中；4、科学和伪科学的研究，对个人和集团在工作与业余时间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应用于商业目的和政治目的。所有这些，都互相联系，造成“富裕社会”的综合病症。这个社会的存在和

得以维持就依赖于各种商品的不断生产和大量消费。于是，必须把社会的、政治的需要变为个人本能的欲望，为此，需要通过经济活动、并把社会心理学应用于宣传工具、通过各种社团组织以及政府来控制影响个人，使人“异化”，成为工具。这便造成“富裕社会”中，个人的紧张和负担。尽管美国“精神分裂”和“心理治疗”十分普遍，但是人们的心理压抑紧张，其根源在于社会，并不是所谓“心理治疗”所能消除的。这被称为“由社会结构转化为个人心理结构的真正矛盾”。

在美国社会学界近年还新兴起一种“社会生物学”，以一九七五年哈佛大学教授埃德华·威尔逊发表《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科学》一书为代表，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有生物学的基础，来自要求生存和繁殖的本能。一个人帮助别人是为得到报答，人的善行根源于生物基因的自私性，都是为了自我利益，甚至母爱也只是一种遗传上的“投资政策”。社会生物学家还认为，冲突是生命的本质，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成为一个胜利者的诀窍就在于把侵犯他人的本性维持在适当的水平上，太少了会被击败，太多了，会过份消耗自己，结果也被竞争者击败。换句话说，关键在于侵犯别人时，要认真盘算“所付代价和所得利益”。这种理论虽遭到反对，其队伍还不断扩大，包括社会科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他们甚至宣称：“迟早，政治、科学、法律、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都将成为社会生物学的分支。”

（三）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现在注重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的研究，大量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检验经济理论，提供经济关系系数的估计数字，用作制订政策依据，并应用系数的估计数字以预测经济量的值，使决策者能够判断是否要预先采取措施以影响有关可变因素。例

如关于就业政策，政府需要掌握当前就业情况以及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将来（如五年内）的就业水平如何。有了经济计量技术，就可以取得这种就业水平的估计数字。如果就业机会过少，政府将采取措施防止，如果就业机会多于预期劳动力来源，政府也要采取措施。对管理经济来说，“预测”正日益显得重要。这次问到一般经济学家，多数认为：经济预测对资本主义的开放式社会较难掌握，现在可以预测两年；对于像“中国式的封闭社会”，中央计划起决定作用，预测技术比对资本主义社会容易。

现在，美国把电子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对生产流程、各种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全部及时掌握。这一套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加上计量经济学，使它能减少一些生产的盲目性。再运用后期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所谓“用国家计划补市场经济的不足”，这一整套不能说对美国经济调节不起作用。

但是，六十年代美国为减少失业，加速经济增长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十年来的通货膨胀并未能换取失业缓和。七十年代以后，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人口增加与通货膨胀恶性并发。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正在破产中。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海布罗纳对资本主义前景提出悲观预测。他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有如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对封建社会的销蚀作用。科学技术要求自觉的计划，它与不能保证社会稳定的市场经济自发调整互相冲突，必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在这过程中，被剥削群众的阶级斗争只起较小的作用。将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将是由专家学者领导的、有科学计划、合理组织的社会体系。这种观点也是布热津斯基《专家统治社会》、加尔布雷思《新工业社会》等书的基本观点。

七十年代中期，海布罗纳又出版《人类前景的研究》一书

(1974年),认为“人口爆炸”、自然资源的滥用和环境污染将在三、四代以后造成地球上不可避免的“生态灾难”;对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工业社会”都无法解决。到那时,经济落后国家由于“人口爆炸”和“生态危机”,由于全球自然资源已被发达国家占有,将在军国主义政府领导下发动战争,要求重新分配世界财富。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止增长,贫穷居民阶层将向富裕阶层发动斗争,出现“人人反对人人的战争”。

(四) 历史学

美国史学界,三十年来,在理论、方法论上一向强调社会科学不能确立普遍规律,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事件堆砌;用各种偶然性因素和历史人物心理因素解释历史事件十分流行。有的历史家认为真理就在资料里,研究历史,不需要理论,只需要掌握资料和“评价资料的技术”。结果是研究狭窄的、局部问题的著作越来越多,对历史事实的描述代替了对历史事件内部联系的分析。

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上全国利益从来是一致的,没有欧洲传统观念中的阶级斗争。在这种观点笼罩下,美国史学者中分成有影响的两派:新保守主义派和新自由主义派。

新保守主义派主张重新研究美国全部历史,除注意早期阶段即殖民阶段和独立战争阶段外,还注意研究美国商业史,包括研究工业巨头生平、垄断组织内部历史,把大规模商业活动看作美国经济亦即美国历史发展的动力。

新自由主义派同样否认阶级斗争,但认为美国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思想不断斗争,前者是主流。它注意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认为工会有利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应当与资产阶

级政党及国家机构在内外政策上合作，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发挥作用。

近二十年来，美国史学界出现许多新的流派，开始注重社会经济史，美国黑人史也受到重视。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较有系统地利用档案文献，有的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法，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研究历史过程和历史人物，有的从文化史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广泛利用“口头史料”，但还没有重要的系统性著作。

（五）对苏联、中国的研究

目前美国大约有一百五十个研究机构从事苏联经济、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其中约有二十个机构专门研究苏联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前者是一九四八年由卡内基基金会创设，后者是一九四六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组织。自一九七五年开始出版二十五卷本的《俄国历史和苏联历史现代百科全书》。

美国对我国的研究，由传教士裨治文开始，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长期侧重我国历史哲学研究。一九五九年，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拨款四千万美元开展中国研究。六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化大革命后，各基金会开始组织对现代中国的大规模研究。各大学政治、经济、社会学、法学、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学者都动员起来研究中国。组织形式有三种，一是在大学本科各系设立有关中国的课程；二是在各州立大学设立小型、中型的中国研究中心；三是六十年代开始建立的大规模中国研究中心。既从事研究，又培训人材。据有的美国学者介绍，这支研究队伍现有近四千人，另外还有五百人在受训。这批专家一般都有较好的现代汉语训练，多半在美国学习中文一两年后，再到台

北深造两年。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对古代汉语也有一定水平。近十多年来，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大革命起因与发展上。其次，研究我国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及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夏初的“百花”时期等各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分析这些政策产生的背景，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制订政策过程中，党与政府内部的“争论过程”等。

2. 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合作化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工业管理等问题。还有一些学者注重研究我国建国以后各项重大政策，如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政策、军事政策等的变化。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国经济加强研究，分析我国经济结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等；还加强研究我国政治的民主化发展，如一九七七年在密执安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召开了全国性学术会议，讨论分析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参政的机会，对领导人产生和各项政策的影响等。

3. 对中国共产党史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重点研究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党在现代中国各个时期的作用，党内重大路线斗争等。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方法是分析毛泽东同志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加以历史的研究，并与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对照，探讨毛泽东同志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此，目前还在争论中。

4. 对我国的地区性研究。对一个地区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已出版有关广州、上海的书籍，关于天津的研究也正准备出书。

关于资料来源，除美国多年收集的文字资料，原在华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提供的资料外，一是利用台湾掌握的我国历史档案；

二是我国报刊、电台的新闻稿，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小报，据称美国方面收集到有十六万份；三是来我国访问的外宾以及由我国外迁或叛逃分子的各种报告，据称香港收集的这方面资料有几百万份。在美国设有专门关于中国的图书资料中心，到世界各国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藏有自十九世纪起，中国各县县志、中国各种报刊，这个中国图书资料中心有极大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中文、日文图书共五十万册，现在全美有十余个东亚研究中心，收藏中文图书共七百五十万册。由于使用电子计算机通过终端设备，可以了解全世界中文图书，并且可以影印。

（六）法学

美国法律制度除沿袭英国不成文法外，还有大量联邦法律、各州法律，十分复杂，需要大量律师。据称，美国七百人中便有一名律师。法学院自认是职业学院，自成一股势力。法学院毕业后，有的到政府，有的进企业，有的开设私人律师事务所，代顾主办理纳税、买卖产业、离婚、民事诉讼等，是十分赚钱的行业。在美国法学界，有人认为法学是行业，而不是社会科学。近年来，有的学者努力提高法学的学术地位，但成效不大。

当前，美国法学研究的动向是：

1. 法理学研究不发展，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出现。目前，法学方面，基本上还是两派：实证主义派，依照制定法，现行司法实践来判定行为的正当性的思想流派；以 H.L.A.Hart 为代表。另一派是自然权利学派，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经济功利主义；以耶鲁大学 Ronald Dworkin 为代表。

2. 跨学科研究增多。如调查犯罪与家庭关系和社会系合作，调查企业诉讼情况与经济系合作等，这样，把法律与政治、经济、社会学相结合，发展出许多新的课程。

3.开始注意外国法、国际法。二次大战后，美国在国际上扩大活动，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不得不研究外国法、国际法，新近还兴起“多国法”，研究涉及一批国家利益的法律问题。

对于外国法律的研究还成为了解外国政治、社会的一种手段。目前美国的外国法研究，一个重点是苏联法律，另一重点是中国法律。很多大学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还注意研究我国法律制度、商法、税法、投资法、中国与外国订立经济条约中的法律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的法律地位、美台贸易中的法律问题等。

研究中国法制有四个中心：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所，以科恩教授为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以爱德华教授为中心；加州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以李浩教授为中心。

现在，不少美国法学教授要求来我国讲学、充当法制顾问，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甚至在这方面进行竞争。还有的律师要求在中国设立事务所，代办海事诉讼、纳税、专利权、版权等问题。

（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当前美国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偏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白话作品，例如宋元以后的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研究唐诗、宋词的已属少数。

研究方法和态度也和过去不同，主要是把西方文艺批评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普拉克斯，运用法国文艺批评中的“结构主义”理论来说明《红楼梦》的艺术。耶鲁大学的斯蒂芬·欧文教授运用俄国文艺批评中的“形式主义”理论来分析韩愈、孟郊诗的风格。这种尝试不论

成败都值得注意，它表明中国古典文学已不再与世界文学隔绝，不再仅限于汉学专家的范围，而逐渐与西方文学中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作品一样，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

美国的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近年有所发展。它通过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共性，又各有特色，比较同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现在，对一个小国的文学研究也可能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半世纪来西方关于荷马史诗的看法是从美国学者密尔曼·帕里研究南斯拉夫民歌得来的。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更是比较文学尚待开发的宝藏。美国学者希望中国学者来承担扩大比较文学领域及于中国文学的任务。这也同样要求我国文学研究者放宽视野，为更好了解中国文学，需要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需要研究一点中国文学。

*

*

*

我们的印象，美国社会科学中应用学科如经济学中计量经济学、企业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各地研究；国际法、多国法；社会学中人口理论、人口统计等有其长处。其他学科也有局部可取之处。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例如，选题反映现实需要，很灵活；选题一般很细很具体，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无论政治、法律、文学、语言学，都日益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各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分析问题比较细致。但是，总的说来，美国的社会科学是在实用主义思潮支配之下，只着眼于解决个别实际问题，科学理论很贫乏，在社会科学各主要领域，都谈不到完整的理论体系。学者教授为数很多，有杰出成就的却很少，难得听到哪个学科拥有“一代宗师”式的学术权威。在方法上，往往割裂事物的内在联系，回避本质问题，分析

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繁琐哲学。

多数学者搞的是“微观”研究，注意具体“案例”的分析研究，特别长于运用计算机就大量数据进行分析，而忽视对当前重大根本问题就其出路与方向进行认真的探索。

在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方面，美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在发挥个别学者积极性之上，通过基金会拨款的方式，全面规划。美国的研究机关往往标榜“独立”，实际从全局看，显然是各有侧重、有全国性通盘计划安排的。大学或研究单位对研究人员的课题并不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而是发挥每一个研究人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由研究人员自己选题、拟订计划、预算，向各种基金会或研究机构的董事会提出申请，由基金会或研究机构董事会审查、批准拨款来掌握。有时，基金会也预先提出需要研究的课题，拨出款项，到全国或国外去征聘专家。大的私人基金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及政府设立的“全国人文学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 可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归口单位。这种基金会由董事会决定方针，董事一般是由有名望的政界学界人士组成，私人基金会虽受财团家族直接操纵，但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政府高级人员也对基金会的活动方针有很大发言权。

2、政府与社会科学界人员交流频繁，来去非常自如，对双方都有很大好处。政府各部门可以从大学物色学者，向大学请假离职（通常大学规定不得超过三年），到政府工作。经过几年再返回大学。如奥克森伯格原在密歇根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工作，被卡特物色到白宫工作。此次访美时，奥克森伯格与我们闲谈中表示，中美邦交正常化，实现了他素来的主张。现在，他感觉自己“思想空了”，需要回到大学去“充实头脑”。尼克松时代担任基

辛格对华事务助理的理查·所罗门离开白宫后，现在就成为兰德公司的社会科学部主任。这样的实例很多。

3、大批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放在大学，研究机构实行“少而精”的原则。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很大一部分在大学，研究机构一般规模并不太大，但人选很精。我们所接触的研究机构，都要讲经济核算，低成本、高效率。研究人员并不很多，可是阵容很强。担任专题研究的，多半是有学识能深入思考问题的学者，聘期不是终生的，视研究的贡献而定。因此，在研究机构里，很少听到泛泛不着边际的空论或人云亦云的滥调。研究机构不时组织学术讨论会，约请外单位学者参加，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业务辅助工作班子、行政班子都很精干。居行政领导职务的多半是三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年富力强的入。

4、鼓励独立思考、推动学术研究。像布鲁金斯学会接受政府委托的研究任务，从研究所的方针就明确“既要与政府联系，又要独立研究”，要求科研人员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怕与政府有关部门意见相左。每一本研究著作出版之前则持慎重态度，书稿要请外单位三位代表不同见解的学者审查，是否有出版价值、质量如何，就此提出意见。如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每年对联邦政府预算、政府收支项目进行分析研究，设想多种方案提供国会。今年总统提出预算后，一月份该学会人员开始分析，才三个月已写出书来（二百多页），正付印中。

5、以国会图书馆为中心的全国图书资料网为国会、政府和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全国各主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图书馆都用电子计算机联合成网，检索专题资料只需十几分钟便可得到回答，效率极高。在全国图书资料网国会图书馆又成为最重要的中心。国会图书馆的特色是主动为国会制订政策提供所需的资料，为此设立了庞大的研究部，下分法律、经济、

外交国防、科技与科研政策、教育与公共福利、环境与自然资源、政府部门问题七个组，共八百五十人，其中专门研究人员五百五十名，多半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仅外交国防组便有五十名研究人员。各组都主动到政府有关部门、大学和社会上收集各种资料，经过筛选，提出专题研究资料，供给国会议员、政府、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对有争论的问题则反映各方面的主张。反映的形式不仅用书刊文件，还到议员办公室当面讨论，或送录音带，把专家或各阶层群众辩论一个问题的全过程如实反映。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公开的。这个做法很值得参考。

总起来说，美国社会科学有它的根本弱点，又有不容忽视的力量（仅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各会员组织就有二十五万名学者）。它的组织形式则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镜的地方。

三、学术交流问题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以便吸收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为我国人民服务，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外国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交流。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同样是不可缺少的；这方面的必要性，还需要引起更多重视。

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科学交流，在调查研究中，在思想斗争中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实行闭关自守、夜郎自大，造成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局面，严重阻碍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社会科学方面的国际交流，我们才能向今日世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调查研究，克服思想僵化、十分落后的局面。如果没有一大批社会科

学工作者从事这种调查研究，并且和我国进行比较，应用这种调查研究的结果来推动改进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则我们的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都不可能做好。再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根本的优越性，但还很不完善，我们当前正需要以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我国正在扩大国际贸易，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它的最新发展。我国长期受封建专制、等级思想统治，缺乏民主，封建小生产习气浓厚，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政府体制、工作方法等带来许多不利影响，在这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具体作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镜的。

从社会科学的具体学科来看，美国在应用经济学、系统工程学、国际问题研究、世界各地研究、情报科学等方面，具有相当高度的发展；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某些分科如多国法、人口理论、人口统计等，也有它的长处；其他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方面不一定比西欧领先，但美国社会科学、人文学门类齐全，英文的图书资料最多，也最能及时反映全世界在社会科学、人文学方面的进展。因此，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进行社会科学交流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代表团在访美过程中努力注意既不是盲目崇外，又不要自高自大，而是采取实事求是、分析比较的态度。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创造国际安定环境以利我国建设，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态度、方法是不可分的。

美国社会科学界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有他们的评价，我们对自己的优缺点也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学者往往急切希望开展学术交流，我们则知道，由于我们自身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区别轻重缓急，逐步开展。

为准备今后与外国的社会科学交流，我们感到急待解决以下五个问题：

1、认真开展调查研究。美方对我国社会科学界情况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我们对国外学术界组织、人物、活动也必须赶快建立档案库。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都开展这项工作，要有专人负责抓这项工作。出国访问带回的资料也要充分利用，选择有价值的进行翻译、介绍。对国外各大学院系、各研究机构的情况、各学术团体情况，都需要收集分析、研究。对国内各学科进展和学者名单，同样需要经常调查。

2、确定社会科学对外学术交流方针，制订具体计划。此次我团访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表示，今秋派人来我国考察社会科学交流前景，十二月来人讨论明年交流项目，明春来人与我讨论学术交流长期计划。对此，我们必须早作准备。社会科学对外学术交流的总方针有待制定，然后根据国内外情况制订学术交流计划，如不抓紧时间进行，就将步步陷于被动。

3、制订资料保密解密条例。社会科学学术交流，首先涉及研究资料问题。目前，我国有些机关对国内学术研究也以保密为由封锁资料，将来对外学术交流开展，问题更大。有些资料经过一定时间，可以解密（国外有的规定为二十五年）。我国在这方面如无规定办法，将来外国学者不仅对我学术界、接待单位不满意，而且对我国一些制度也将引起不满。

4、制订接待条例。目前美国来华学者，除要求接触我史料档案外，更多是要求作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典型材料，并通过实地调查验证他们原有的一些推测、估计是否准确。对此，我们没有经验，是否有必要规定条例，内容包括如：事先提出研究目的和工作计划，不得进行研究题目以外的调查；在基层单位调查必须遵守我政府法令和地方风俗习惯，遇到困难时，不能都要求

我中央单位代为解决；研究成果要提供我方等。美国以我国没有学位制为理由，要审查我方出国学者资历，我国对外国来华从事研究的学者也应有审查资格的权利。有了这一个条例，可以避免将来产生纠纷。对我国内院内接待单位也可明确职责权限，便于检查改进工作。

5、加强领导问题。我国目前对外进行社会科学学术交流有教育部、社会科学院两个口子，再归口到文化部。苏联与美国社会科学交流则是科学院、教育部两个口子直接对外，科学院交流着重在专题研究，教育部交流着重在培训师资及研究生。按我国情况，或许仍以两个口子搞对外交流较切实际；社会科学院与教育部经常互通情报、协调计划及进行步骤十分必要。

赴美访学观感点滴

费孝通

一、赴美访学一月，历经十城，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拉手道乏，举杯祝酒的人数，每城以百计。数量冲淡了质量，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又分道扬镳了。如是访学，难入堂奥。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开门亮相的作用，连定场词都唱不完。

我个人的特殊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行相视，不宜轩轻，因而须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东拉西扯。二是少壮好弄笔墨、拙作流传海外已有四十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二十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三是我三十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静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入鬼箴；尚存者亦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相互达意

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勉为其难，甘苦自知。

以上是这次赴美访问个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想惟有找个我认为可靠的引路人当向导，他是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1930—1933）的同班同户老同学杨庆堃，美籍华人，从四十年代起即在美国各大学里任社会学教授，现在匹茨堡大学任教，是该校六个荣誉教授之一，在美国社会学界有一定地位，认识的人多，堪当识途老马。由于美国大学教授退休年龄延到七十以后，所以和我同年的这位朋友还能在这门学科中活动（退休后就不同）。我在出发前就把我要了解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变化及当前美国社会学的基本情况的问题提纲寄给了他。他为我向我所要访问的各大学里的同行熟人进行了联系（为此他打了一百多次长途电话），使他们能事先安排和我会晤的日程和根据我的要求进行准备。

我在结束华府访问序幕后，即偕同薛葆鼎同志（他是匹茨堡大学毕业生）同去匹茨堡，各就老关系，摸索门道。我找到杨庆堃，在三天中，除受到该大学隆重款待外，向该校社会学系诸教授深入长谈。老杨又怕我年老记忆力衰退，约请相熟的教授三人分别为我编写备忘录，其中有关美国社会变化部分长达一百六十多页。这样热心相待，在美国是少见的。这三天的集中学习为我这次访学打下了有益的底子。如果这次访学学到一点一滴，饮水思源，必须感谢老杨的竭诚相助。他在我到达西岸旧金山时，又赶来相送，把这几篇备忘录递到我的手上。盛情可感，不失为同窗砚友。

同时也得到一条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工作中，必须找到熟悉调研对象的向导，依靠他去建立群众关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提供资料。学术访问也应采取这个方法。

二、通过事先联系，我抓了三个重点（匹茨堡除外）进行比

较深入的了解。每个重点都抓住一个人，他们是：①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教授(Merton H. Fried)，②波士顿，M.I.T.的皮蒂教授(Lisa Redfield Peattie)，③芝加哥大学的特克斯教授(Sol Tax)。分别叙述如下：

(一) 弗里德在解放前在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能讲中国话，懂汉文，但并不靠“中国通”吃饭。他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他的著作以《概论》著名，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有一本《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1953年初版，1970年再印)。我是二三年前在一次招待某一美国学术代表团的宴会上初次和他相见的。他当时就送了几本著作给我。这次我到纽约，适逢他去加拿大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为了要和我见面和组织一次讨论会，特地请假返回纽约。我跟他在一起有一个上午和半个下午。我在他主持的一个较大型的座谈会上发了一次言，主要是根据我去年在京都(日本)的发言稿朗诵的，接着答复听众提问。会后反映，答复问题印象比发言为深，但感到时间不够(实际上答复问题时间长于发言)。以后我吸取了这个经验，发言以少而明确为上，多留讨论时间，加强针对性，效果好。弗里德总结时说，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向美国学术界第一次的学术演讲，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是有成绩的，值得学习的。《华侨日报》对这次座谈会连载两天的报导。会后，弗里德约了几个教授请我吃中国馆子，在亲切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并于饭后驱车巡视历史上有名的纽约哈兰姆黑人聚居区，为我讲述黑人问题，坦率诚恳，得益匪浅。

(二) 皮蒂教授是前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女儿。雷氏是美国人类学界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挂帅人物，在学术上倡导对农村的乡土社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著有成绩，他的

调查基地是拉美的农村，不幸早死。我和皮蒂可说是有三代的交谊。皮蒂的外祖父派克 (Robert Park) 是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帅，一九三三年到燕京大学讲学，我听了他的课，受他的影响，开始提出实地调查中国社区的主张，和杨庆堃等同学一起编印《派克社会学论文集》。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初访美国，在芝加哥见到派克的女儿，即雷德斐尔德的夫人，皮蒂的母亲。雷夫人自告奋勇，帮我编写Earthbound China(《乡土中国》)一书。当时我根据中文底稿逐句口译，她边记边问，然后写成英文，半年脱稿，我又在雷氏的乡间旧居写该书最后一章。日夕相处，情谊颇笃。当时皮蒂还是个中学时代的小姑娘。一九四九年雷德斐尔德应约到清华讲学（此事是出于我的动议），携眷及幼儿詹姆斯住在燕京大学招待所。我又和他夫人口述我当时在各刊物发表的文章。她回国后，汇编一书即China's Gentry(《中国士绅》)。当时詹姆斯还在小学。解放后，我和他们断绝来往，其间雷氏夫妇相继逝世。雷夫人经常向其子女及友人表示对我的怀念，并于死前遗嘱将我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书版税保存，中美复交后归回我。其女皮蒂继承父学，是M·I·T第一个女教授，曾在拉丁美洲调查研究，著作受到人类学界的重视，主要是研究第三世界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现在M·I·T人类学系研究波士顿的公助住宅问题。她把人类学研究开展到现代城市规划中的人事工程的领域，是一棵人类学里的新苗。其弟詹姆斯在芝加哥大学任古典文学教授，有著作，用人类学观点研究古代希腊文学，别树一帜。

我到达波士顿，皮蒂即来寓所相访，驱车到她所研究的地区巡视，一路介绍研究经过和她的见解，我向她说：我在三十年代并不认识她的父亲，天各一方，但是到四十年代一见面，却发现我们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现在又见到她，三十年的间隔，我们又走到一处去了。但是，现在是她已走

在我的前面，对第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研究已经做了有十多年了。现在又开始研究美国都市问题。我希望有一天能拜这位小妹妹当老师，如果她愿意收这个老学生的话。我还说，她的治学像她的爸爸，她的文采像她的妈妈，写一手简洁流利的好文章，在幽默处胜爹娘一手。她又带我去拜访退休中的美国社会学老辈，我初访美国时的名教授休斯，Everett Hughes，派克的接班人。他送了我一本他写序、跋的《派克传》。皮蒂的谈话使我对美国社会多了一些较深的认识。

(三) 特克斯教授早年是雷德斐尔德的助手，继承后者的学业，六十年代是美国人类学界的重要人物，历任美国及国际人类学会的主席和国际性权威刊物《当代人类学》的主编。现年七十三岁，已退休。我过去没有见过他的面，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我在芝加哥时，他正在拉丁美洲调查。但由于我和雷氏一家的关系，他对我是十分熟悉的。这次见面分外热情。我和他在芝大召开的人类学系座谈会上相见，当即约我于下一天到家相叙。翌日，一早，他偕夫人及女儿女婿四人亲自来迎接我到他女儿家作客。他的女婿弗里曼 (S. Freeman) 是芝大人类学系教授，年轻健谈，议论新颖，常不苟同其翁之论。其女苏姗是另一个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当天收到一本她新出版的著作，就送给我，作为纪念。我坐定后陆续有他相约的知交来到，包括和特克斯齐名的同事伊根 (F. Eggan)。这次家叙，谈得透澈。弗里曼夫妇分析尖锐，如指出“行为科学”这名词的产生是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家想拿福特基金的钱，而这个基金的董事们却认为“社会科学”这个名词和“社会主义”太接近，所以这些人不得不挖空心思地制造这一个新名词。他也同意我的看法，社会科学中许多新名词是贴在旧货上的新牌子。他很痛快地点出：美国人类学的理论是通过英国输入的大陆货，特别是法国产品。这些都是一语破的的提法，给

人启发。

特克斯是年老持重的人，他的一生以提倡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 出名。其实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理论，而是要求人类学必须为其研究对象，即文化较落后的民族，起建设性的作用。他反对把这些民族作为“掠夺”学术资料的对象。因此，他听我介绍我国的民族研究时，十分兴奋。我讲完了，他接着就向我提到一件事，就是美国的一些人类学者已商量要在明年四月份召开的一个人类学会议上给我“马林诺斯基纪念奖”，马氏就是我在英国读书时的老师，我表示这是过奖，我这些年来实在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可言，而且要在会上发表一篇论文，我也准备不好。他立刻说，“你今天讲的就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再讲一遍就行。”

这次家叙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值得一提。我的一位燕京时代的老同学卢懿庄，现在芝大任社会学系副教授，女，也被邀参加这次家叙，她一进门，苏姗抱住她，高兴地向她说，“费教授已经来了，他一个人独自来的。”原来美国的国民党报纸放出谣言说我在美访问是受人监督的。苏姗发现这是谣言，所以高兴得在卢懿庄面前跳了起来。有特克斯这位有名望的教授作证，此事传出，是对国民党的一个打击。

三、从访问的面来说，历经十个城市，大学有匹茨堡、哥伦比亚、耶鲁、哈佛、M·I·T、密歇根、芝加哥、加州、斯坦福、夏威夷等。每到一校除全校性负责人接待外，分别就专业组织座谈会，以我为主宾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各一次，每次一般是半天，亦有加班达一天的。大学之外还有以研究机构为主人约请座谈的，计有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全国科学院、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威尔逊研究中心、布鲁金斯研究所、国会图书馆、兰德公司等。研究机构的座谈会以听取主方报告为主，而各大学的座谈会一般是宾主对话；由于我的特殊情况，在社会学及人类学座谈会上却

常是主问客答的局面，因此宣传较多而了解较少。从点滴的观感中得到一些不全面的体会，略述如下：

（一）理论贫乏、缺乏主导；烦琐微末，各家分立。这种基本情况可以从老杨替我翻译问题提纲时提出的一个意见说起。我在问题提纲里用了“学派”一词，老杨来信中说美国已无“学派”，只有不同“理论”，所以建议不译作 School 而译作 Theory。这触起我的注意。原来“学派”是指我所熟悉的三十年代以来英国人类学的那种师徒相承的门户，有祖师立说，掌握学坛，在理论上有一套，在学术界有一派势力。一个学派是一个职业性的垄断组织，可说是学阀。如功能学派就是以马林诺斯基及雷德克列夫-布朗前后为主，把持英国各大学的讲座达三十年之久，几乎是独霸天下。直到六十年代才发生世代交替，祖师的及门弟子（第二代）于七十年代几乎全部退休，告一段落。在美国并无此种情况，四十年代我初访美国时，各校分别均有名教授各树一帜；如哥伦比亚的林登(Linton)、哈佛的克拉克洪(Kluckhohn)、芝加哥的雷德斐尔德、加州的克罗伯(Kroeber)，还有两位能干的女将：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Mead)，这些人现在都已去世。七十岁以上的人物尚为学术界所尊重的，惟特克斯和伊根等少数宿儒而已。现在各大学任教的像上述哥伦比亚弗里德一样的人已经不多。他们大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复员军人。战后美国实行的办法是复员军人按入伍年数公费入学，为学术界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构成当前社会科学界的主力，现在是五十岁上下。这一代似乎和上一代不同，理论修养没有前辈深，底子浅些，学究气少，善于标新立异，各行其是。特克斯说，现在美国召开的人类学会有点像置身于联合国会议的气氛。百家争鸣，群龙无首。这是老杨之所以不愿用 School 而想用 Theory 来译“学派”一词的客观背景，也提示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情况。

(二) 所谓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其特征之一就是知识的应用。在工业里科技知识已成了生产中决定性的要素。影响所及,社会科学里也出现“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的概念,和“知识营业”(Knowledge Business)的组织,兰德公司就是典型例子。这就是把知识作为商品,公开接受定货,进行生产的公司组织。这种新型的服务行业的出现,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就业的渠道,也就影响了学科的本身。过去大学里的社会学课程是作为公民必修的常识而得到普及的。一九七八年美国设立社会学系的大学有二百一十五个,教授、副教授共四千五百八十二人。这是各大学研究院销售博士级毕业生的主要市场,在上述新型服务行业出现之前,大学教师是这些社会学博士的主要出路。为了培养这些每周要登台讲上三小时以上的教师,必须具备一套言之成理的学说,也就是所谓“理论”。设立研究院的大型大学,或称高级学府,为了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必要占领一批小型大学,容纳它们的毕业生。有点像不同工厂生产的货物各有其垄断的市场,其产品也须标上不同牌号;同是饮料,可口可乐之外还有7 up 等等。这是各大学的社会科学要制定一些特别的配方,即所谓“理论”的原因所在。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竞争是推动力,标新立异,打击别家,抬高自己,也就相率成风。自从“知识营业”发展以来,显然又产生了一种变化,那就是崇尚“应用”。大量学者,如匹茨堡大学里给我上课的几位教授,都在致力于所谓效果测定学(各种Assessment)。在兰德公司,我曾听一个专业小组讲他们怎样测定对贫民公费医助的效果(这是向政府承包的一项定货)。围绕这些研究工作,大量利用电子计算机,发挥所谓“模式论”。

所谓模式论(Model)是指规定一些作为前提的事实条件,然后演算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程序和规律。这套作为前提的条件,

并不完全是主观假设，但也不是客观上已出现的现实，而是各种可能出现的事实，演算是根据已被证实的事物间存在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尚未证实，就得按各种可能性来推测。演算的程序和可变因素的处理十分繁重和复杂，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这些演算成为可能。就其演算来说确会使人有神妙之感，但看完之后，对其结论来说，却又会使人有故弄虚玄之感，因为不经过这一番电子世界里的折腾，似乎单凭人体思维，甚至已有常识，也可以得出同样结论。对此，我是门外汉，乡巴佬，不敢多赘一词。

这种模式论在我看来可以认为是实用主义的产物，这和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提高理性认识的唯物辩证法是不同的。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转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力量到了这种应用社会学，已经相当贫乏的理论园地，更显得萧条萎靡了。这二十年来，新的一代中连赶得上前一辈的雷德斐尔德、米德、克罗伯的人都尚未产生。特克斯为我组织的“家叙”中，有一位女人类学教授为我解释当前流行的所谓“象征理论”(Symbolic Theory)，我听完后，发生了一个问题：这理论在哪些方面突破了马林诺斯基在 *Coral Garden and Magic* 一书里关于语言的作用论呢？在我听来，在这一套新的名词的装璜下，还存在着似曾相识的掠影。就在我这个疑难前，那个放言无忌的弗里曼说出了我在上段所引的话，美国人类学的理论至今还是些法国学者的二手货。——所谓的法国学者早年是 Durkheim, Mauss, 后来是 Levy-Strauss。

(三) 事物必须一分为二，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它的弱点里也包含着它的长处。它的弱点是见木不见林，抓战术而忽视战略，但见木和战术上讲确是认真，锲而不舍，颇有成就的。知识之有别于空想是在其反映客观事实，在学术工作上，就是理论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说来必须充分掌握资料(数据)(data)或“情报”(Information)，这里包括资

料的搜集、核实、整理、归类、储存、应用。我们旧时的考据之学也就是当前广义资料学中的一部分。美国社会科学在资料工作上有很大的发展。其所以能大发展者，一是由于现代科技的飞跃，二是由于尊重直接观察得来可以考核的事实的精神。他们能不惜工本地大量搜集实物、文字、口头记录等等第一手资料，反复核对考证，系统分类，归档、储存，随时可以提供查阅应用。近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使这方面的工作得到惊人的飞跃。我参观了许多图书馆、博物馆，印象极深。不说别的，只就我们一般研究工作而言，大量时间耗费在查找资料，为了一段话要找个出处，就可以费上一天，甚至几个月都借不到所要的那本书。在美国现代化的研究机关里，凡是已经储存在情报系统里的资料，在几秒或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显示在案头的荧光屏上。这怎能不激起我的羡慕？

从资料到结论的分析综合过程，又是美国社会学者着意重视的焦点之一。不妨举几个我这次访问中听到的实例来说。

四月二十四日在华府参加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座谈会上听到一篇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主题是怎样利用已有的不太准确的资料来取得接近于实际的结论。研究者细致地分析这些资料可能发生错误的因素并算出误差程度，然后逐一校正这些资料。其洞察入微、思考周详处令人折服。我当时就表示这种治学精神和所循的方法值得我学习。我过去同样接触过这些资料，每每因其不太准确而丢弃不理。物尽其用，在于用之者的水平，我愧不如。

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座谈会上，基希(Kish)教授讲统计中的选样法的运用和效果。统计中的选样法是要解决以点概面的问题，要了解全国的情况，不可能一一调查，只有选择少数重点作为样本，根据这些样本的情况，用统计方法来取得反映全面的

结论。如民意测验，他们在二亿人口中只选取几千个样本，测验结果往往很符合全面情况。怎样选择是大有讲究的，对此基希教授颇有研究，而又津津乐道。一再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推广这种方法于社会研究工作。我也表示在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调查中点面问题是必须重视的，选样法值得我们学习。当天下午，他们的人口研究室又特别约我交谈了一次。

在旧金山加州大学遇到人类学系的施坚雅 (G·W·Skinner) 教授，他是以研究中国传统市集组织著名，进一步根据中文历史资料研究历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国的乡村市集组织最早是杨庆堃在一九三三年调查山东农村时的研究对象，后来我在江苏和云南农村调查中也接触到这个题目，但都不够深入，也没有用这些直接观察到的资料联系到历史资料来分析，探求它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施坚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钻研这个问题，成就也就超过了我们。值得提到的是他向我提出一张开列有十多种我国的地方志，每本书后注明现在中国何地 and 哪个图书馆有这本书。他说这几本书，中国之外是没有的，希望我能帮他看到这几本书，允许他照相，作为研究资料。我答应他向有关方面反映他的要求，同时，他那种探索资料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

(四) 接着可以讲几句关于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早期所谓“汉学”着重在语言、文学、古代历史和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不是重点。最早在中国教会大学教书的学者们做过一些这类工作的有北京市调查的甘布尔 (Gamble)，南京金陵大学调查农业的巴克 (Buck) 等。中国学者早年也有用英文发表有关当代中国社会调查的著作；我那本一九三九年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生活》)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被美国各大学的人类学系定为入门必读参考书之一，因而这一代的人类

学者都知道我的名字。这本书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创新(这是我的博士论文,处处跟着老师的方向走),而是为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三十年代及其之前的人类学都是以殖民地的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在美国早期主要是研究北美的印第安人,三十年代后期扩展到拉丁美洲;英国早期是研究印度洋及南太平洋各岛屿的土著,三十年代起主要研究非洲民族,五十年代扩及南亚但重点还是在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来的殖民地人民纷纷独立,民族主义高涨,西方人类学者可以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日益缩小。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走上研究经济比较发展的社区,也不得不把眼光投向自己的社会。当前,美国人类学里就有所谓都市人类学、医疗人类学以及上面提到过的参予城市规划的人事工程研究等等。而我早年的著作都是以中国人类学者的身分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所以也就被认为起了先驱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我国人民得到解放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在国际形势中举足轻重,加上我们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促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都想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记载着解放前中国农民生活的那些书,也就成了有助于了解当前社会的历史背景的重要参考资料了。这种书在西方为数不多,我的著作也就容易受到注目。

中美关系中断时期那些想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的人只有到台湾和香港去进行调查。在过去十年里出版过不少这类的调查报告,在方法上大多以我那本书为样本,但立论上却有不少是以批评我的姿态出现的。有一部分是要驳倒我“中国农村的经济衰落是出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的论点。比如不久将来我国作为交流的研究人员的波特(Potter)就是如此,他强调西方工业的影响对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不论他的立论怎样,他见到我曾说,他过去就是用我这本书作为模本,并唱反调的。这些在台

湾学中文和汉语，和在台湾或香港进行过研究的人，确是不免受台湾的影响，加上当时美国反对我国，这新的一代对我国的感情和上一代是有所不同的。我们除了要注意这种情况外，我认为，有必要主动培养立场公正的学者来研究中国社会。门不宜关，要关也不一定关得上，关了反而处于被动地位。怎样转变这些不利因素，是一个值得切实研究的课题。关键应当是在加强我们自己的调查研究，才有能力去吸收别人正确的观点和资料，和反驳别人错误的观点和资料。学术战线上只有以学术来取胜，别无他途。

我还感觉到美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向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有所不同。社会学者不少是希望在中国找到服务的机会，如表示在人口调查、社会效果测定等等方面他们能出力，提供新技术。也许可以说是想开辟一个应用社会学的新市场。有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提出为我们训练使用计算机的技术及研究人员，这是开辟新市场的第一步。我认为这也符合我们的需要，是可以考虑的。很少社会学者向我提出要求研究中国社会。提出这类要求大多是人类学者。而人类学者提出的要求又很少属于研究少数民族的问题，绝大多数是要研究汉族的农村、家庭、人口以及如老年人问题等社会学方面的题目。

四、一路上在各大学的座谈会上和会后总是有人提出想到中国来研究或工作的愿望。有的委婉些，有的爽直些。我总是表示原则上是欢迎的，但是在社会调查的范围内，依我看，真正的交流还要一段创造条件的时期，目前还未免过早一些。这倒不是他们不易得到我们领导上的批准，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参予群众的生活，必须要群众能接受他们这些调查者。我们不是大洋洲里的一个小岛，像我老师马林诺斯基那样，把Trobriand岛民作为试验室里的老鼠一样，剖视几年，卷起袖子扬长而去，写他的科学著作，置岛民的生死于不顾的这种调查者，我们的群众是不会愿意

接受的。我们欢迎国外的朋友来帮助我们，有如白求恩医生一样，他才是一个值得讲文化交流者引为榜样的人。即使我们的要求不这么高，也还得逐步摸索出一个互相有利的合作方式。

这块挡驾牌当场是起作用的。但是要到中国来搞第一手资料，回去写本书，名利双收的还大有人在。看来有正门和旁门两个渠道。正门来的就是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说明要来中国蹲点做实地调查，而且在美国制造舆论，甚至施加某种压力。戴维-弗里曼和波特就是这样的例子，前者已到，后者接踵就来。最近听说下半年又有一人要来，他有中国妻子，想住在广东的内舅（妻子的舅父）家，进行一年之久的调查。所谓旁门者是指以其他名义来我国工作，附带进行调查，我在密歇根遇到该校人类学系女教授戴蒙德(Diamond)即将到山东大学教英文，希望假期可以进行调查工作。这些都是公开的，至于秘密进行的，那就无法估计了，我认为秘密不如公开，旁门不如正门。正门不开，必走旁门，旁门关紧，则有私道。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措施了。

由于我挂出了挡驾牌，直接向我要求蹲点调查的并不多（也有，如哥伦比亚的Kehl，研究生，缠着我不放，电话、信件、当面谈话像连珠炮，我始终没有松口），要求找具体资料的有如上面提到过的加州大学的施坚雅(Skinner)，要求一般交换资料的极多，这里不胜枚举了。

另一方面，邀请我去讲学的、访问的、参加会议的却很多。口头表示只要我有时间愿意去，立即可以发出邀请书，一切费用均由彼负责的，计有匹茨堡、哈佛、M.I.T、密歇根、芝加哥等校。对此种善意的表示，除道谢外，并未作任何许诺。加州大学（伯克利）早在前年已来信相邀，曾征得我院领导同意，继续协商具体方案，这次访美时由校长出面正式来信邀请我为该校“贵宾”，什么

时间去，住多久，干什么都由我自己决定，生活和路费由该校担负。我见到该校校长时表明返国磋商后再正式答复。另外，比这更具体的是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加和美是相联的），去年就提出要邀请我去讲学，该校每年要邀请一位国外的著名学者去作库明斯纪念演讲，是一种荣誉讲座，为期十天。四月份该校正式通过发出给我的邀请信，并由林达光教授到芝加哥当面给我传达此事。上面也提到过芝加哥大学特克斯传达某一国际人类学学会明年有意给我“马林诺斯基纪念奖”，大约四月开会。明年如不能去，后年在英国举行时再去也不妨。此事等正式来信后再向院部提出考虑。

最后提一下编写我传记的事。现在已知道的有三起。

（一）奥格什(Arkush)。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新社会学和费孝通》，前年曾寄了一本打印稿到中央民族学院，并没有直接寄给我。我看到了这本稿子，今年他来信说将出版这本书，并希望在美国和我相见，我同意在芝加哥见他（他是在离芝加哥汽车走五小时的Iowa大学里当教授）。见他时，我表明不是同他校订文中事实是否可靠。这是他自己的事，作为历史学者，就要在考订史料的真伪上表现他的水平。在这方面我不应当插手，也不应当负责。而且如果我发表了意见，会使他为难。他不该相信我所说的全是符合事实的。我说，“我不愿把你这个历史学家贬低成一个新闻记者，这样做就对不起你和你的老师了。”这样说了，他也就点头同意，我们的谈话始终坚持这个谅解。

（二）麦克杜格尔(McDougle)，在我访美前接到他的来信和打印稿。说是要出版一本中国国内有关一九五七年对我批判的文集。文集选了我当时被批判的关于社会学的议论，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和若干篇对我的批判文章，并在前面加上一篇我的小传。我没有给他复信。到了美国，看到了一个书局的广告，该书已

作了出版预告，我还是置之不理。

（三）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又遇了一个人，名字没有记下，说有一个关于我传记的稿子要送给我看。在离开该地的前一天，通过联络员狄安其要求见我。我谢绝了，有稿子要给我可以邮寄国内。

我对于别人对我的各种说法，始终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凡是不符合事实的叙述或议论，自有公论，不必自辩。人生有限，无需在这些毁誉上费精神，何况自己也并非最后的评定者，留待后世去议论，有何不好！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 研究简况

钱 钟 书

在这次访问中，美方照顾我的专业（中国古典文学）和“余兴”（比较文学），安排了同行的对话和座谈。和各大学里比较文学研究者都是个别会晤，可以从容谈论。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会面常是一伙人把我围住，大多是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美国人、美籍华裔，还有香港和台湾来美留学或任教的人），不等我开口，就提出有关我的几种旧作的问题，七张八嘴，使我应付得头晕脑涨，回答得舌敝唇焦。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向他们了解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动向；尽管那样，我还知道了一些情况。

老辈的美国“汉学”家多数能阅读文言，但是不擅口语。后起五十岁以下的“汉学”家，多数能讲相当好的“官话”或“普通话”，而对文言文感到困难。所以，当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也偏重在古典文学里的白话作品，例如宋、元以来的小说和戏剧。接触到的杰出美国学者里像哈佛大学的Patrick Hannan是研究话本和《金瓶梅》的，普林斯顿大学的Andrew Plaks（四十二、三岁，公推为同辈中最卓越的学者，祖籍南斯拉夫，通十四、五国语文）是研究《红楼梦》的，芝加哥大学的David Roy（去冬来华相访，这次外出未晤，但留下给我的信和著作）是研究张竹坡、金圣叹等对《金瓶梅》、《水浒传》的评点的。像哈佛大学

James Hightower研究骈文和词（他极佩服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记》）、耶鲁大学Stephen Owen研究韩愈和孟郊诗（他对毛主席给陈毅同志信里肯定了韩愈的诗，甚感兴趣），已属少数。研究的方法和态度也和过去不同；纯粹考据当然还有人从事，但主要是文艺批评——把西方文评里流行的方法应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例如Plaks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是用法国文评里“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Levi-Strauss, R. Barthes等的理论和实践）来解释《红楼梦》的艺术。Owen有名的韩孟诗研究是用俄国文评里“形式主义”（Formalism）（Victor Shklovsky 派的著作六十年代开始译成法文和英文，也听说在苏联复活）来分析风格。这种努力不论成功或失败，都值得注意；它表示中国文学研究已不复是闭关自守的“汉学”，而是和美国对世界文学的普遍研究通了气，发生了联系，中国文学作品也不仅是专家的研究对象，而逐渐可以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品成为一般人的文化修养了。一位西德学者（Manon Marien-Grisebach）曾把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分为六派：实证主义或考据派、思想史派、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派、形态学派、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派；两位意大利学者（Maria Corti, Cesare Segre）曾把它分为七派：社会学派、象征主义派、心理分析学派、风格学派、形式主义派、结构主义派、表意学派。看来这些流行的西方文评方法还没有完全应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里，但也很可能都已应用，只是我闻见有限，不知其详。在华裔学者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研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刘若愚（外文所刘若端之弟）、译注《西游记》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余国藩（广东籍，长大在台湾，三十余岁，并通希腊文，表示欲回祖国，但他父亲是蒋经国手下军官，对他哭道：“你一走，我就没有老命了！”），都是公认为有

特殊成就的。一般学者们对《金瓶梅》似乎比《红楼梦》更有兴趣，在哈佛的工作午餐会上，一个美国女讲师说：“假如你们把《金瓶梅》当作‘淫书’（Porn），那么我们现代小说十之八九都会遭到你们的怒目而视（Frown Upon）了！”——这句话无意中表达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的社会风尚。我联想起去秋访问意大利拿坡里大学，一位讲授中国文学的青年女教师告诉我，她选的教材是《金瓶梅》里的章节。一般学者对宋元以来小说戏剧有兴趣，他们在我的同事里，对孙楷第先生也就比对俞平伯先生有兴趣，例如 Hannan 就希望自己访华时，能和孙先生一见。

我这次晤见了美国有名的三位比较文学家，耶鲁的 Lowry Nelson Jr.、哈佛的 Harry Levin 和 Claudio Guillén。以五卷本巨著《近代批评史》闻名世界的耶鲁退休教授 R. Wellek 恰恰旅行他往，否则也会晤面的。其他像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 Charles Witke 自说是为江青写传记的那个“讨厌女人”（that odious woman）的前夫，取的中国名字是“魏大可”，特来相见。我读过 Nelson Jr.、Levin、Guillén 三位的著作，谈得很投机，我们都认为：比较文学有助于了解本国文学；各国文学在发展上、艺术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异而求同，因同而见异，可以使文艺学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一个偏僻小国的文学也常有助于解决文学史上的大问题，例如半世纪来西方关于荷马史诗的看法是从美国学者 Milman Parry 研究南斯拉夫民歌得来的，中国丰富伟大的文学更是比较文学尚待开发的宝藏。我向他们称述了胡乔木同志《关于文艺理论研究问题》里有关中国散文、诗和“欧洲的散文”、“各国的诗”比较那一节话；引了懂得中文的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 R. Étiemble 在一九六三年一部著作里所说：“没读过《西游记》，正像没读过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却去讲小说理论，可算是大胆。”他们都说：中文是个很难掌握的语言，外国“汉学”家学会了中文，常

常没有余力来研究自己本国的文学；中国人有语言天才，因此，把比较文学的领域扩大及于中国文学，主要是中国学者的任务，别国人不能胜任。这也许是他们的客气话，但不失为对我们的正当要求，向我国的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放宽视野和接触面的问题。就是说，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我们也许该研究一点外国文学；同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我们该研究一点中国文学。

我在美国各校访问，还怀着本位主义的私心，想替我所（文学研究所）的中年、青年同人找一些去美研究的机会。经过了解，老年学者应聘“讲学”，无须具有运用英语的能力，可以由美方搭配翻译；“研究”人员在利用图书资料（尽管是中文的资料）和日常讨论时，都须有一定程度的英语知识，不会伴随着助手的。美国学者很关心他们的著作是否为我国学者所知道。我说：“英语在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者里还未人喻家晓，翻译也很费事。正像我们用生硬的英文写出论文向西方传达我们的学术成果，你们是‘汉学’家，何妨用中文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我想我们的学术刊物会乐于发表，听说哲学所的一个刊物曾发表一位英国学者的来稿。”Plaks说：“这才是真正的学术交流，我们的各种刊物也欢迎你们来稿。”Owen说：“这是对我们‘汉学’家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未必经受得起，但是我们不该畏避。”讲起美国人学习中文问题，他们都说在香港和台湾（所谓Stanford Program）的学习效率比在北京的高，当然在北京除语言以外，还可以接触到“真正的中国文化”。

最后，略讲一下有关我自己的事，那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当前动向的一个微末部分。我去秋在欧洲，就知道我的四本解放前旧作在台湾和香港流行着好几种“盗印”本，但未看到，这次大家拿来请求签名，都目睹了。还知道《围城》原有台湾翻印本，后来由于序文里嘲笑蒋介石“还政于民”那句话，本文里讽刺抗

战时期大学里的训导制，台湾出版当局便禁止翻印。在文化革命时期，海外盛传我已身故，并发表悼唁文字，台湾就把《宋诗选注》盗印了两版。四月二十三日我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美国之音》派记者张翔（后知为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之弟）录音采访，提出了四个书面问题，其中之三是：“以研究《围城》作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者不止一起，对此有何感想？”各大学座谈会上所发的问题，性质相仿。还有询问各书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我是否续写过或将写小说；何以我的作品在海外盛行而在本国绝少人提起；《围城》里有些部分极像“愤怒的青年”所写小说，我写作远在他们以前，他们也决不会看到我的东西，怎样解释这种巧合等等。在哈佛，有人给我看一本新出版的有关中国戏剧论文选，收了我二十四岁时所写一篇英文文章，紧接着一个美国人近年驳我的文章，问我看到没有，“有何感想？”在密歇根，有人给我看美国人所写《比较文学新动向》的书，称引了《谈艺录》，问我看到没有，“有何感想？”在洛杉矶，有人给我看台湾一个姓叶的文章，贬斥《谈艺录》为“被捧过高”，问我看到没有，“有何感想？”诸如此类。《围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出于Jeanne Kelly和Nathan Mao（第二个英译本是Dennis Hu的，尚未完成），今秋将由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社社长派人到芝加哥和我接洽，并给我看译本《引言》。我只看了有关身世的部分，有些是不知那里来的“神话”，我删去或改正了。有个Theodor Huter正写一本分析我的文艺创作的大书，特从加拿大到斯坦福来会我，要“核实”我的身世中几个悬案（例如我是1910还是1911年生的），我知道那些“神话”都是他辛辛苦苦到香港和台湾访问我旧日清华大学师友得来的。他说搜集到我在《清华校刊》上的投稿，清华毕业照相等——一切我记不起或者愿意旁人忘记的东西，我回答说：“我佩服他的努力，但我一点不感谢。”他也把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在我的

作品上。他还告诉我有个华裔学者（我没听清名子，也没有追问）是研究我的“文言”作品的，除《谈艺录》外，还从老辈的《诗话》和解放前刊物里搜集了我的一些旧诗，正等待着《管锥编》的出版。哥伦比亚、哈佛、斯坦福、夏威夷大学的亚洲语文系都邀请我在最近的将来到那里去“讲学”，哈佛还提出明年“Lowell 诗学讲座”（Lowell Professorship of Poetry）的建议，请我考虑，我自度不能胜任，都婉言辞谢了。

美国法学界情况

芮 沐

在美国，法律仍是人数最多的一个行业，同医生一样，它也是收入最高的一行。现在学生从法律学校毕业后有三条出路：进入律师事务所，当律师；进入工商企业界，做买卖；或进入政府机构。美国的法律学校是普通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学校（Graduate School），学生年龄较大，社会知识较多。过去中国学生在美国学法律的不多；华侨后裔在美国学法律的也不多。原因是，这个职业对有色人种一直是封锁的。战后，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黑人地位的提高，影响所及，情况有所改变，中国人学法律和进入律师界的人多了些。我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遇到不少来自台湾的学法律学生。

美国以善于争讼著称，它是全世界律师最多的一个国家（全美大概有四十万人）。法律管制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几乎全部生活；政界、经济界、企业界，到处可以碰到学法律的人。经济界还有它培养公司企业经理人才的另一途径，商学院（Business School）就是例子。

美国学法的人多，有好些原因。一是它具有开发新大陆，建立美国合众国，为个人民主权利斗争的传统。二是它的社会政治制度，连同它的法律体系比较复杂。美国除了有以普通法（Common Law）为基础的不成文的判例法外，还有庞大繁多的联邦法

律。例如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国会曾经提出公、私法案共两万二千三百一十三件，其中众议院的一千八百一十个法案，参议院的一千四百一十三个法案，还专门做了说明报告，最后通过三千二百一十一个法案和决议，八百零四个法案成为正式法律。一九七八年的税收法案长达一百八十四页，这还仅仅是一九五四年国内岁入法的一个修正案。国会有五千多个工作人员帮助着议员和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作草拟立法的工作。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以至二次大战后，政府各部门、各个机构又颁发了大量的各行其是的行政条例 (Regulations)。此外，美国五十个州还有它们自己的宪法，一般法律和行政条例。与这些众多的法律俱来的是烦琐众多的程序规定。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重重社会矛盾：个人与个人之间，各阶级、阶层、种族之间的矛盾，大小公司企业之间的矛盾，个人、集团、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犯罪率、犯罪形态非常突出；垄断资本向外扩张时，在其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也发生着许多矛盾。

在白宫办公室舒尔茨 (Charles L. Schultz, 白宫经济顾问) 同我们的座谈中，他承认美国经济当前三个麻烦问题是通货膨胀、能源日益依赖于进口和经济增长率的减退。他提出的两大解决手段是平衡预算和加强经济作为 (包括制订货币政策、信用政策、税收政策、福利政策)。他没有提到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 (他对提高资本主义经济效能的主张，可参看 Charles L. Schultz, "The Role of Incentives, Penalties and Rewards in Attaining Effective Policy" i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PPB system*. 一九六九年向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在同布鲁金斯学会的座谈中，高级研究员奥肯 (Arthur M.

Okun)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现状的讲话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高效能的市场经济。所谓效能是以一定的“投入”(input),即人力、设备和资源,取得最大最多的“产出”(Output),即货物和服务;认为美国公经济和私经济这种混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发挥效能满足消费者的巨大优点。他承认资本主义以货币报酬或惩罚为手段的效能,产生经济上的不平等;但不平等的收入,他认为是提高效能的刺激。以收入的不平等换取效能,以提高平等作为略微牺牲效能的代价,是美国资本主义可能发展的前景。

(参看 Arthur M.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一九七七年布鲁金斯学会)

在美国很不深入的一个月经历中,除了罢工是在街头在各个领域随时可以看到的现象以外,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政府干预运动(包括反税收运动、消除条例管制运动Deregulatory Movement)的发展,也是较容易观察到的。

在法学和法学研究领域,有三点情况可以略作介绍,作为参考:

一、法学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怎样是一门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似乎已觉察到法学只谋求解决具体诉讼纠纷的职业观点的狭隘性。提出要把法律当作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来研究的意见;要求检查“美国在法律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思想上和知识上的深渊”;要求“把社会调查的方法输入法律学校的课程中去”。很有意思的是,在白宫办公楼举行的关于政府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来制定政策的座谈会上,他们邀请了一位联邦上诉法院的黑人法官海金布撒来讲述“社会科学与种族关系”,举了几个著名的判例,说明法官利用社会科学的成就来拟写判决书的情况,引证了最高法院法官布兰代斯(Brandeis)的意见,“一般法官在他们的造就中缺乏经济和社会科学的必要知识。”在美国社会科学研

究理事会所组织的座谈会上，还分组专门座谈了“法与社会科学”的课题。

但看来这方面努力的成效不大。由于在美国学法律的人数多、势力范围大，职业观点和实用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思想理论上的探讨未见有多大发展。当然，要求美国法学者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学是不可能的。但即令是资产阶级的理论思想，近年来也缺乏重大的建树；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很少有较深刻的思想家或理论家出现，没有巨大的著作出版，编著论文和资料集作为著作的情况较多。在法理学方面，曾经谈到的有哈佛的Rawls和耶鲁的反实证主义、反经济功利主义、宣扬个人自然权利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讲究策略目标的麦克杜格尔(Myres McDougal)和理想主义者福尔克(Richard Falk)等少数人。国际法方面，他们在哀叹没有象奥本汉——劳特伯赫，奥康内尔等的巨著，前一代学者已经退休，后继无人；缺乏世界知识，懂其他外国文字的人少。

另一方面，由于实用主义的传统方法，他们的研究讲究权宜应付(Expediency)，讲究实效，着重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着重于研究(Issue-oriented rather than Research-oriented)，强调社会科学为制定政策服务的作用，在所有社会科学部门（包括法学）中，表现得都很突出。白宫座谈会中，例如关于制定预算法案前进行经济预测的介绍；在全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大会(ABASS)小组会上，关于联邦对于社会问题知识的投资，以及对于社会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资助的介绍；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对于它们的工作和调查研究的某些成就的介绍；国会图书馆给美国国会立法提供图书资料情况的介绍，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所作的某些社会调查，有时看来很细小，很琐碎，不涉及原则问题，但他们掌握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政府和庞大基金的支持

下，他们掌握和调度这些人力及资料的能力确是惊人的。他们并且拥有最现代化的电子工具，如Lexis和Xerox等，为之服务。在法律学校里，除了教学以外，多数教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政府工作，或则进行着有基金支持的研究工作，或充当着垄断企业或法律事务所的顾问。学校是政府工作和工商企业和法律事务所的接替站。有的学校如哈佛大学还直接为联邦政府培育着行政领导班子，参与政治。

二、第二个较为显著的现象是学校中名目繁多的跨系课程的设置。可以说这也是对狭隘的法律职业观点的一种反响。

法学方面，跨系课程和跨系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突出地表现于法学与政治学 and 经济学(工商经济)课程的相互交叉上。例如各大学开设的国际法(最广义的)课程，总算起来有七、八十种名目，如法与社会，法院实践，法理学，美国外交政策，外交史，苏联外交政策，中国的国际政治，比较政府(非洲、亚洲各国政府)，欧洲政治制度，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环境法，国际工商业交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三层空间法，海洋法，武器管制与裁军，战争法，世界和平、政治地理，二十世纪国际意识形态、帝国主义，人权，等等。

法学院国际法的课程大体包括六个大方面，总算起来，各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六、七十种之多。当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整套课程。这六个方面是：①海洋与海运；②空间与空运；③外国法与比较法(亚洲法、苏维埃法、拉美法、比较国际刑法、诉讼法、证据法、法国德国民法等)；④国际法和跨国法(Transnational Law)；⑤国际组织；⑥国际工商活动(国际交易、国际税收、国际投资，外援与开发，共同市场等)。其中不小一部分又是和经济系、工商学院系(Business School)交叉的，即我们称之为国际经济法的那些课题。

在国内问题方面，法律所关注的一直是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的管制和干预以及民权。在国际方面，近年来较集中地研究的是世界和平、人权、人口、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分配、国际贸易。对于这些问题，他们都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不同角度并综合起不同角度来作研究的。这就是学校中、法学院中开设这些跨系课程、边缘课程、综合课程的来由。

学科的交叉也反映在人物的交叉上。他们通常赞扬的人有：非学法律出身的政治学者、不时在法学院教课的布里格斯(Herbert Briggs)、伊万斯(Alona Evans)、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法学家不时在政治学系教课的如哈佛大学的索恩(Louis Sohn)、哥伦比亚大学的亨金(Louis Henkin)、福尔克(Richard Falk)。法学家称得上是一个社会科学者的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曼(Wolfgang Friedman, 已故)、耶鲁大学的麦克杜格尔(Myres McDougal)，曾是耶鲁大学、牛津大学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法理学教授的德沃金(Ronald Dworkin)。

三、重视东西方关系的研究是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现象。他们长期来重点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法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这次访问中接触到的专门或重点研究苏联问题的机构有威尔逊中心、兰德公司等。它们掌握的关于苏联方面的情报和资料，既广且多。在法学方面研究苏联法律的人，我们遇到的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哈泽德(S·N·Hazard)（此人从四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研究苏联法律），还有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利普森(Leon Lipson)。这些人都曾多次去过苏联，而且在美苏法律事务中作过不少工作。

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美国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在美各大学中有着不少华人和外国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二次大战后，中国问题一度曾是美国东西方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对

象，现在仍是如此，但在新形势下，它有着新的表现。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每隔三年编著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材料（1972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1975年《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1978年《毛以后的中国经济》，是这方面工作的最好说明）。

在法律方面，美国学校研究中国法律的有四个中心。

一是以科恩(Jerome Cohen)为首的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所。科恩从六十年代开始，曾有好几年在香港调查中国的法律制度，著有《中国刑事诉讼》《中国国际公法》等书。他曾吸引过不少台湾的中国学生来到他的中心学习，他同时是纽约大国际事务律师公司Coudert Brothers的顾问；如同哈佛大学的许多教授一样，他奔走于爱德华·肯尼迪之门，对中国事务、特别在经济联系方面有不少活动。他曾多次来到中国。今年三月他曾组织一批经济法教授为我外贸部门的干部和一机部工作人员讲授合资公司和投资法；七月将偕同哈佛和哥伦比亚的一些税收法教授和香港一些律师前来中国讲授国际税收法。

第二个中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兹(Randle Edwards)是其中心人物。爱德华兹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夫人是台湾的中国人。他是纽约最大的法律顾问公司希孟·斯德林(Shearman & Sterling)的顾问。他曾专门邀请我同这个律师公司的主持人蒲立德(John C. Bullitt)见面。蒲立德同时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董事，亚洲基金会的主席。蒲立德要我们用书面表示接受亚洲基金会的津贴，派遣留学生或进修教师去哥伦比亚大学和该律师事务公司学习。目的显然是为了换取我国政府部门和对外经济机构可能给他们的好处。

三是美国西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外国地区比较研究所结成的中心，在中国法方面主要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李浩(Victor Li)。李

浩是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法学研究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毕业，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主任。著有《没有律师的法律》、《逆转承认台湾》、《中国外贸中的法律和政治》等书。他是全美华人协会的积极分子，曾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奔走。他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的地位和对美台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作过证，并且曾为中美解决冻结资产问题向美国财政部递过备忘录。

四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ABA)的国际法中心组主席小华利斯(Don Wallace)，是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国际和外国贸易法研究所的所长，随全国律师协会代表团两次来过中国。副主席是勒布曼(Stanley Lubman)，是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所培养出来的中国问题专家，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现在是旧金山香港Heller, Ehrman, White & Mecaulliffe律师公司的顾问。集中在搞中美之间的买卖。这个中心组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〇年有下列题目：“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公司订立合同和合资事业的前景”，“与通过中美贸易协定有关的法律争端和问题”，“中美贸易中的仲裁和纠纷解决”，“为同中国进行贸易提供资金的新形式：补偿贸易，贷款辛迪加，外国信贷的其他形式”，“技术转让引起的法律问题：专利法、商标法和特许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律问题的的发展：民、刑、商法典的实施”，“台湾的法律地位和将来美台商业关系的法律结构”，并将就“同人民共和国贸易的法律问题”出版一本书。

重 访 美 国

薛 葆 鼎

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七日，我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代表团有时全体活动，有时分组活动，有时个别活动。访问过的大城市，有华盛顿、匹茨堡、纽约、纽黑文——波士顿，安阿波——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火奴鲁鲁。同一些有代表性的政府机关、学术团体、研究所、大学、企业见面，进行学术交流，有时是小型报告后座谈，有时就专题个别交换意见。

三十年来看惯了中国模式、走过两次“之”字形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机会看个把月美国模式，依然是世界一霸的资本主义经济，我感到对照鲜明。刚刚去的时候，感到：一般美国人民还是那样勤劳、坦率，爱开玩笑，有礼貌、肯帮助人；对照着我们青年一代的一些情况，我的感触也很多。怎样来认识美国呢？到处是大型机场、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五光十色的商场、旅馆……。怎样透过“花花世界”的现象来认识其本质呢？由于走马看花，难免浮光掠影。现在说几点不很成熟的看法，也可能是不一定对的看法。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那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战时军火繁荣正在消退，而美国政府挟胜利的余威，企图君临全世界，喊出的口号是“一个世界或者一

同毁灭”，要求实现的是独霸世界的“美国世纪”。三十来年之后，我重访美国，得到的印象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生命力，但已经象一个“年过半百”的人，正在“走着下坡路”；它希望看见的是能够相对长期地保持世界“实力的均势”，维持一个“多病的现状”。它还不象是“风烛残年”，但已经无力进取；它不改霸权实质，但在盼望苏联也走向守势，为此，它主要拉着有经济实力的日本和西欧做伙伴。为什么这样说呢？要看三十来年的变化。

三十来年美国的变化确实大。突出的，反映内因的变化有几个，它们互相交织着，矛盾重重：

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又取得了巨大进步，已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看来还有条件进一步发展。

（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被希特勒驱逐到美国去的爱因斯坦、乃恩斯特、佛米等大科学家起了“催化作用”似地帮助美国的科学技术飞跃上世界高峰之后，六十年代的电子计算机化，又使美国的物理、化学、数学在尖端课题上直接结合起来，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取得了许多技术上的，工程上的，经济上的成就。现在微型电子计算机直接纪录、操纵、追踪、复核着物理、化学、生物、生理上每一个试验，每一瞬间的、“不连续的连续”的变化，综合许多微观现象，还能进一步、更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用数字来表达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从而设计出许多可控制的生产流程，转化为创造得出新成果、新产品的新型生产力。大型电子计算机联结成的网络，又足以进一步帮助人们高效率地组织、管理、改进社会劳动。已出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使四十二万个科学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完成了交给他们的、已被分解得很小的往往是单项的试验任务，从而同时参与进了这一个巨型的科学实验。已实现了的飞探金星、木星的航天计划，进一步说明了科学技术

已达到当前的“艺术境界”。生产力要发展，看来还大有可能。

(二) 三十年来美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看来既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也同时存在高浪费）的条件下，开发出来了一个高水平的市场容量，也说明了这么大的市场容量还有可能容许生产力进一步高度发展。新型仪表、电子控制的汽车、冰箱、烤炉、空气调节设备、洗衣机、电话机、高频对话机、彩色电视机、录音机等等都在进入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形形色色的商品赊销、分期付款，还能弹性地扩大市场容量（某些岗位上的相对工资也有所提高）。

(三) 三十年来美国的工厂面貌，工业区面貌，进步很大。美国钢公司在匹茨堡河边排列着的几个大钢厂，福特汽车公司在底特律的狄亚朋联合工厂，都是二十年代开始、办了几十年的老厂，都已一步一步、特别在六十年代中期采取了不少防污染措施，工厂区环境保护得很好；主要设备都已在原有厂房内经过几次更新，实现了生产控制的电子计算机化。对待老企业，正确地更新和改造，当然要增加投资，但其经济效果和稳定周围社会经济的关系，都比我们弃旧就新，片面搞基本建设，不认真改造老企业，大不相同。而过去在工厂周围的住宅区早几年就已经向远郊区风景幽美的丘陵丛林地带延伸出去。从波士顿到林肯、卫士登，沿高速公路有很多几百人的小厂，专业化生产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等的重要零部件，它们靠勇于改进自己独有的尖端技术，产品精良，在大工业优势和市场竞争严酷的环境中生存、盈利和发展着。这些小厂同大公司协作着，最根本的条件是固定资产负担小，易于技术革新。如果不靠技术精进不懈，一旦落后，就得被淘汰或被吞并。这是一种美国模式的大中小型企业并存之道。另一种小型工业典型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混合、复合肥料厂，根据土壤分析，作物种类，因地制宜地制造区域性的颗粒肥料，氮

磷钾配比好之外，另加一些微量元素，几乎同小型机修厂那样分布在各地。这两种小型工业的搞法，都反映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特点，值得我们注意。

（四）大银行、大公司、大型联合工厂、大型图书馆，大都已经电子计算机化了它们的管理系统。在一般是条块结合的组织机构中，业务首脑可以随时运用电子计算机的“终端”了解基层生产、经营的基本情况和统计数据。企业管理更便于计划化、科学化，使生产和需要衔接，使经营和计划适应，也使各个岗位的职能和执行情况都可以用数字衡量。整个企业对人、财、物的管理，对产、供、销的运行，信息反映灵敏，指挥调度全面，便于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便于奖励和发挥各个职工最大的积极性。管理科学有利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资本追逐利润。然而管理也要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电子计算机、最微型胶卷、高速复印机、灵敏的高频电讯网就是管理上的生产力。

二、几个现实经济问题长期敞开在美国人民面前，习以为常，没有解决方案。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舒尔茨说，面前十八个问题难办，其中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经济停滞最棘手。他很坦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一）通货膨胀率。五十年代后期每年平均百分之二点二，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每年百分之一点八。越南战争中军费浩繁，财政要预支，一九六八年上升为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九年超过百分之六。一九七三年达百分之八点八，一九七四年竟到百分之十二点二，一九七五年仍达百分之七。一九七六年为百分之四点七，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平均为百分之六点五，今年二、三、四月的通货膨胀率折合年率高达百分之十四。三十年前的“五分——十分商店”不见了，“一元商店”也不见了，零售消费品如八个纸碟子或一个薄荷锭，最低价为六十九到七十九美分，连税

金得七十二到八十二美分。地下铁道收费从五美分涨为五美角。四十年代卖三十多美元一件的上装标价达二百美元上下。现在的美元实际贬值到只值那时的三十美分。七十年代初,平均国民收入每年约两、三千美元,一九七七年后平均约七千八百美元。现在约八千元。一家四口收入低于八千美元即算低于贫困线。军备竞赛、军事援助,政府靡费,都在通货膨胀中转嫁到人民身上。

(二) 失业率。一九七三年占劳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九,一九七四年占百分之五点六,一九七五年占百分之八点五,一九七六年占百分之七点七,一九七八年约占百分之八。但两千多万黑人中实际失业率在不同地区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五,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二,甚至百分之四十。十来个居留地上已少于一千万的印第安人还不在话下。保护少数民族就业的立法,六十年代前后规定机关、企业、学校都得雇用百分之五少数民族职工,成为“消除种族歧视”、换取选票的幌子。实际上不解决有色的少数民族失业率特高的根本问题。

(三) 能源危机。美国占世界人口二十分之一,消耗世界能源三分之一。美国每年生产石油约四亿六千万吨,而每年消耗石油约九亿吨。美国国内的石油储量、天然气储量,到了七十年代都已只能支持十来年年产量。从“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九七三年联合起来决定石油涨价以来,石油危机早就喧闹了多年,最近由于伊朗政局变化而再次触发。美国的石油财团却趁机抬价限售,今年四、五月间,石油的新价比旧价高出七分之一以上,实际上保持着百分之二百的高利润。目前还在继续涨价。但是,近几十年来发展成的高速公路网,远郊住宅区,每周两天假日游乐习惯,都需要大量小汽车来消耗汽油。赞成不赞成“降低汽油费”成了政客间吵吵闹闹讲废话的题材。石油危机在经济上的连锁反应,越来越复杂、严重。今年四月,开始出现了排队买汽油的“长

龙”。怎么办，明知危急也拖着。

（四）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停滞，慢性膨胀间的矛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而经济增长率这两年只有百分之一，通货膨胀率却每年超过百分之六点五还多，时间长了，矛盾就尖锐了。

（五）环境污染问题。新厂要在开建时就强调防治，使生产过程对环境保护有利，而且明确认识清楚环境保护是生产保护的一个环节。老厂要趁设备更新时逐步投资，逐步改造，才能办到治理污染。费用往往很大，需要的时间很长。美国是在资本主义各国暴露了公害问题的六、七十年代开始解决这一问题的。成绩还是很明显，有的工业区已基本控制了污染问题。现在电站、机械厂、钢铁厂治理得较快；石油化工厂治理技术要求较高，进展较慢。福特汽车公司的狄亚朋联合工厂，从钢铁系统到汽车装配系统，为了治理污染，累计费用五千万美元，相当于固定资产的十分之一。但一般新厂搞得好的，可以低于十分之一，而一般老厂所需费用往往超过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十五。考虑这一问题时并不必需同资源综合利用牵连在一起，而就是只强调要消灭公害。许多企业诉说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越干涉越具体，要求的标准越提越高，借口是费用太贵，影响成本，妨碍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甚至想方设法去运动议员削弱反污染的立法。所以说要在高标准上真正解决工业污染问题，阻力还很大。直到前不久，哈里斯堡原子能电站漏逸了放射性物质，威胁到周围二十英里距离以内二十万居民的安全，纷纷出走，才警惕到这样性质的工厂应该建设到荒漠地带去以防意外，却已搬不动了。对于这种放射性的污染问题才又一次议论纷纭。

此外，在食品供应极丰富的情况下，美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营养不良。在城市大厦林立的情况下，美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住

房匱乏。这种社会基层的问题，同为了筹教育费而放赌、性解放到乱交和职业卖淫一样出现在这个豪富的国家之内，长期存在，实在不是好现象。

布鲁金斯研究中心的劳伦士·克劳士对我们发表了《世界经济展望》，预言今后一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能乐观。通货膨胀将成为资本主义各国的普遍现象，石油价格将上涨三分之一，制成品将上涨百分之十到十五。估计各国将实行保护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力求自保。美国由于要支援日本和西欧，经济上势必自己要认吃一点亏，因此，将有一个暗淡停滞而通货继续膨胀的前景。现在看，这一信号已经来到了。

三、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实际上在加强，在无可奈何的下坡路上寻找最佳方案。

总统预算委员会负责人列夫林对我们说：他们的职责是要做好：（1）来年度财政经济的预测；（2）安排每个法案的费用；（3）分析财政开支的效用；（4）掌握牛奶成本的补贴，组织以煤代油的研究，管理社会救济金等等；（5）安排军事开支。这样一个多年事务幕僚有一套现实的理财经验。

实际上美国政府主要控制着的是：（1）企业中的劳动条件；（2）自然资源的保护；（3）环境保护；（4）所得税及其再分配（1975年总数〈按1972年币值计〉达2770亿美元）；（5）社会福利；（6）住宅问题。据说全国每年花费在研究环境保护的开支达一百亿美元；研究以煤代油的开支为三十五亿美元；花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为一千一百亿美元。而在军费和军援方面的开支，今年已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亿美元，人民的负担在这方面不轻。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约二百七十万人；各州政府加地方政府的雇员总数则达一千万人。马、恩当年所说的官僚机构已经庞大到占全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在这里可见到美国资产阶级统治

的巨大侧影。政府的日常工作，几乎同议会中的吵闹政治和院外游说集团的紧张活动很少关联。可是花在情报收集、统计分析方面的钱，动辄在几亿到十几亿美元以上。文件报告，充栋成堆，有些确有见解，可以影响决策；而问题却多如牛毛，见仁见智，往往很象瞎子摸象。但一经“实践”，反复论证过的最佳方案，到头来又未必高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记忆犹新，不去正面总结经验，只想“忘却”了事。官僚主义似乎不一定是封建社会为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能以不同形式出现。

四、美国的企业管理，计划性在加强，效率在提高，归根到底，关键在于决策人要动脑筋，如何学其所长，一定要冷静对待。

纽约 I B M 的总经理劳登巴赫，波士顿 M / A 公司总经理戈尔特，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的人事经理史笛华特，洛杉矶兰德公司的第一副总经理休勃特，火奴鲁鲁狄令根公司的总经理康乃尔，对我们坦率座谈了他们的公司组织，内部制度，管理方法等实际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一致反映一个企业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经济组织，人、财、物需要全面有权管理，供、产、销需要研究统盘决策，这才能有助于企业掌握自己的命运，敢于上国际市场 and 国内市场去竞争；才能发挥企业经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象我们这样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机能肢解开来，由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痛痒不相关的行政领导机关多头下达经济活动指标，在指标不碰头、计划有缺口，条件不凑手的情况下，靠一些动人的口号来鼓干劲，对于干部多年不加经济管理的再教育，搞社会主义经济工作而不懂得国民经济中客观存在比例关系，也不懂得工农业内部都客观存在比例关系，更不懂得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基础知识，而偏偏希望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取得伟大成就，在现代世界上要求得到外国尊重，宛如妄想白日飞升。

其实，美国企业规模再大，基本的管理方法虽有差别，但某些原则似乎是共同的。如：（1）多数采取条块结合的管理制度。**Line and Staff System**，垂直领导，分层分部门负责、强调首脑高度集权而职能部门分工明确，**Check and Balance**，有职有权，当仁不让。强调组织精简，决断准确，执行灵活，赏罚恰当。（2）标榜选拔人才，知人善任，既看有学识，又看创造性，择优提升。因此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综合性培训，叫做“知识投资”。大学或研究生院管理系毕业，被企业录用之后，常常在制造部门、开发部门、销售部门，从基层到中层，轮流在不少岗位上工作，台阶式上升。强调懂市场销售，为雇客服务，眼界开阔，手段灵活，才能当经理，再从一般经理中选拔总经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商，商而优则教育。教授、官僚、企业家密切结合，或者反复变来变去。经过多种渠道，把一些确实精明强干的高等知识分子几乎不拘成份地提拔上去，充当资本家集团在大企业中最高级的代理人。他们很懂得，如果用人不当，搞不好企业，会祸延股东。真搞得不好，就真撤换掉。股东的利益是至上的。（3）理想的总经理标准是：能有胆识到世界市场上去竞争；能掌握联合企业和附属企业的全局；能管理各级经理，迅速鉴定产品质量，力求符合市场需要，促使各部门的管理都有效；能具有中枢思维的全面才能，对产品市场，地区市场，世界市场，熟悉行情，准确预测。（4）强调正确决策和选择计划目标的重要性。总经理要尽职，必须根据自己的正确决策和正确的计划目标，指导计划部门编定经营计划，随时总结计划执行中的经验，随时调整计划安排中的缺陷，控制企业内部的和附属企业之间的有节制的竞争（**Controlled competition**），共同夺取最高利润的经济效果。（5）明确电子计算机只是收集、存储数据资料，进行多模式测算的现代化工具。强调管理是一门依靠人的智慧来指导实践的科学。没有管

理的科学技术知识，有了电子计算机，整个企业仍然会陷入无计划状态。庸俗的经理，误把电子计算机看做是万能的。官僚主义加电子计算机化的管理可以等于混乱与灾难。 $\text{Computer} + \text{Utopia} = \text{Computopia}$ “电子计算机乌托邦”。

五、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是我们很好的一面镜子。美国的经济学者的长处往往是重视求实精神，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微观分析准确，形式逻辑严谨，方法上、技术上值得我们学习。可是存在的主要问题却往往是：习惯于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角度微观世界，习惯于用繁琐哲学来罗列堆砌现象，习惯于用形而上学来推理判断，有时分析高效率、宏观无出路。

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在美国还是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派和弗利特曼学派。从英国凯恩斯的理论开始，在美国形成了学派，后来虽然标榜有所改变，成为“新”派或“后期”派，其实质都是放弃一般庸俗经济学对社会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主张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新旧之间，只在从开始强调财政政策，演变为主张同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以财政政策为主，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期保证社会上有效的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其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G·托平，麻省理工学院的P·山缪尔森，明尼苏达大学、前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W·海勒。而弗利特曼一向主张只搞货币政策，反对政府干预（因而也就仇视社会主义社会搞计划经济）。他因为一九七六年得了诺贝尔奖金而名噪一时。但是，凯恩斯理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经济的拯救、强化作用，强调政治对经济搞计划化的反作用，从三十年代以来毕竟已经发生过“延年益寿”的作用。

经济学中衍生的新学科有计量经济学，比较经济学，预测学等等，都重视数学基础，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值得研究。

美国的企业管理学，按教学方法大致为三个类型：哈佛大学

强调案例分析，决策理论；麻省理工学院强调数理知识，技术管理；斯坦福大学居两者之中，有后来居上的声誉。由于重视个人到企业中找到出路和便于从理工农医各学科转业，美国在电子计算机化之后，工商管理的院系和专科十分兴旺，理论经济的院、系相形之下，比较冷落。

现代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向企图解决四个主要问题，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平衡外汇，高速度增长。但从七十年代初出现了大量失业率增加与物价持续高涨并存的“停滞膨胀”以来，凯恩斯理论碰壁了，而其他各派理论也没有一个能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往往数据论证长篇累牍，而说不到痛处。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同越南战争，同石油危机，同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竞赛，如何联系观察，若明若暗。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陷于用行为主义、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某些领导人物评头品足，抹杀政党集体决策的作用，过份强调个人的历史地位，易于忘却整个问题的历史背景。因此，对现代社会主义经济能运用比较经济学和预测学来全面观测，研究的为数不少，成就却也不多。

电子计算机进入了经济学领域之后，凡事求计量，求构成模式，求纳入程序。把近似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综合收集、储存大量数据，探求可行的各种模式，加以比较，用以代替过去的空想假设，经过上机计算，寻找出最佳方案，确有帮助。因此，密歇根大学的副校长夏皮罗说运筹学、系统工程、预测学，在“关闭系统”内部做得出好文章，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广阔应用的前途。但是一遇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是“开启系统”，运筹预测的本领就只能限于展望一两年前景。如果要求我们见到的经济学家，对未来发展的实质性问题，谈谈如何宏观，茫然如堕入烟雾。要求他们评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远景，要

求他们评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远景，更如缘木求鱼。

社会科学是要面对现实，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是要承担社会责任、历史责任的。可是在美国，两百年来，摆脱了老殖民主义的束缚，驰骋在新大陆上。没有封建压迫，没有传统束缚，凌虐屠杀土著民族，剥削掠夺外来劳工，开发了远比中国实际开发面积为大而多的富饶土地和宝贵资源，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占了那么多便宜，积累了那么多财富，涌流着那么丰富的生活物资，使工人阶级的生活享受资产阶级化，使工会上层官僚都资产阶级政客化，连罢工行动也都化为生意经，连失业群也分享到远比残羹剩饭为优厚的社会福利金，连华灯初上后放纵的夜生活和劫掠奸杀的犯罪行为也在商品涌流热和生活享受狂中被忘却了其客观存在。在享乐主义的社会风尚中，社会前途几乎无人介意，国家观念更是十分淡薄。很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少严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生产力这么发达的美国，思想境界却落后于欧洲。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多次分裂，使美国共产党一再瓦解。五、六十年代，许多进步人士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世界的东方。“四人帮”一被粉碎，又使不少好心紧跟那几年《人民日报》的人掉进了失望的深坑。美国人民当然该自己起来解决自己的前途问题，但是在当前还看不到一面鲜明的旗帜。美国是在社会矛盾重重交织中，孕育着的社会危机或早或晚可能在几个问题的焦点上爆发出来。但是现在还看不见进步的思想界和劳工政党能起而担当领导责任。这一串已存在多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如此，出路何在，要求从理论上探讨出答案来。

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简况

李 新

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向比较注意。虽然经过麦卡锡时代的挫折，但从六十年代起又逐渐兴盛起来。自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发表后，像美国社会上出现“中国热”一样，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的热情也开始高涨。尤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研究中国之风更盛，想到中国来搜集材料研究历史的人已形成一股热潮，估计今后这股潮流会愈涨愈高，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和恰当的对策。

我们询问美国目前研究“中国学”的人数，主人们均无确切、统一的回答。据他们估计大概不下四千人。其中研究历史的约占三分之一。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应自明清开始，当然也有些人认为应开始于鸦片战争的。至于现代史的概念则更不一致：有始于清末的，有始于民国的，有始于“五四”的，更有不少人认为现代史即“共产党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因此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数无法统计。他们说：大致有几百人总不会错。

我们参观过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密歇根、芝加哥、柏克莱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等大学，都是美国研究“中国学”尤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心（只有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们没有去）。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藏书近四十万册。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特别注意共产党资料的搜集。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中

心，藏有中文书近二十万册，很注意搜集中国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它从香港等地用高价买到了红卫兵小报约八万份。它的负责人取了个中国名字叫费维恺，是梅光迪的女婿，曾多次访问中国，可算是个“中国通”。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心互换书目，互相借书。以斯坦福为主（因为它得基金会资助，有钱），组织中国报刊的微缩照象工作，他们缩印了不少中国过去的报刊，据称有全套《申报》微卷，每套售价一千八百美元。他们说有全套（包括各地方）《民国日报》的微卷，但我请他们查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江西民国日报》上登载的叶挺致张发奎的公开信，却始终没有结果。

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数量很不少。在外国人（1949—1977年）出版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千八百二十二种著作中，美国人编写的约占四分之一。至一九七八年底为止，美国人写的中国史著作约有七百种，其中近现代史占半数以上。美国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刊物有《亚洲研究杂志》、《近代中国》、《太平洋史学评论》、《太平洋现势》、《近代亚洲研究》、《当代中国》等，著名的《中国季刊》虽在英国出版，但以美国学者撰稿为多。除学术刊物外，还出版了《清史问题》、《中华民国史研究通讯》等通讯刊物。

美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在第二次大战前，和一般西方学者一样，都是站在西方看中国的。其公式为：“影响——反应”。他们所研究的，多半是和西方有关的问题。战后初期虽有所改变，但不大。只是对“影响——反应”的解释已较前不同。从前总是说西方为中国带来了文明；后来不同了，开始用否定的辞语来描述西方的“影响”。用肯定甚至赞扬的词句来描述中国的“反应”。但中国的历史发展仍然是围绕着西方的影响打转。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促使美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他们承

认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法则，西方的“影响”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开始认真探寻中国历史事件产生的社会原因，不只注意个别英雄人物了。

目前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反从前汉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传统，真正做到了“厚今薄古”。他们最注重的是新中国的历史、中共党史，其次是中华民国史，然后才是清史、明史，研究宋明理学的兴趣还不低；研究唐以前的人很少，只有个别研究汉代史的；至于汉以前则很少有人研究了。不过对考古学还是颇为重视的。研究中国社会史已成为目前美国史学界的风气，尤其对地方史兴趣更大，首先是珠江三角洲如中山、东莞、南海、新会等地；其次是长江三角洲；再次是天津附近以至华北地区。由于着重研究现代中国社会，他们除了重视档案材料外，更重视调查访问，把回忆录、访问记称为“口述历史”。这种风气也传到台湾，所以台湾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地方调查材料、传记、回忆录、访问记，其中“口述历史”居多。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出版物，虽无多大的学术价值，但有些材料（不多）是罕见的、可信的，对我们很有用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题目大多偏而窄，尤其是研究生的论文，其目的在取得博士学位，所以它的题目有的更偏窄到可笑的地步。因此，他们对个别问题钻得深而细，其成果也有可取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善于利用它。因为他们不注意全面、系统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尽管钻得很深很细，征引书目一大堆，似乎很渊博，其实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由于见树不见林，大多数都是较差的。根据我的接触，美国青年一代的中国史学者，汉语程度大都不错，他们用王力编的教科书，从《孟子》读起，要学四五年，所以一般能阅读中国较普通的古籍。他们大多数又到台湾或香港去学过一两年口语，能说一口相当不错的北京话。据说台、港教外国人说普通话，有专门的地方和设施，效果很好，

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这次由美国东部到西部，无论在图书馆或书店，见到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绝大多数是美国、日本和台湾出版的。例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传记，到处皆是。有关周恩来的书更多。写江青的书也不少。这些书的内容多半是反动的，就是态度较好的也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在旧金山的书店里，台湾和香港用汉语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书刊，更是充斥市场，令人难以忍受。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的，为此应该发愤，应该抓紧多写书、写好书，出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也要大力支持，使能多出书，多往国外发行。否则我们是再无颜走出国门的。美国书刊的价格相当贵，相形之下我们的价格太低了。例如我们出的《中华民国人物传记》（第一册）订价人民币一元，斯坦福大学却用十美金才买到一本。因此我建议把我们的书刊订价至少提高一倍，国内私人买书一律半价。这样既便利往国外发行，多得外汇，又有利于在国内减少公家买书，使书刊易于达到真正需要者的手中。

美国学者对中国明清史和民国史的研究很重视。因此，对明清档案和民国档案很关心。台湾蒋帮已将从大陆携走的大批档案交给其“中央研究院”、“国史馆”等所谓学术机关公开使用。交给“国史馆”使用的一九四九年前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的档案即有一百七十二万六千件。台湾各出版社自六十年代起就大量出版清政府档案，向全世界广为发行。如《海防档》、《中法越南交涉档》、《中俄关系史料》、《矿务档》等，均用十六开本精装印行。数量庞大的《清实录》也已影印出版。至于《中国近代史丛刊》、《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等丛书中则包括了不少民国时期的档案。台湾这样做，既为了扩大影响，也为了赚取外汇。我们北京故宫藏有的明清档案和南京第二档案馆藏有的民

国档案，比台湾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但这些“宝藏”我们基本上还未开发。这些档案已无所谓秘密了，应该公开加以利用。用它来开展研究工作，扩大政治影响，促进学术交流，并可从中获取相当可观的外汇。因此建议领导机关给这两个档案馆以必要的条件，让他们能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关中有不少的台湾学人，他们都很关怀祖国的统一事业，并对民国史饶有兴趣。但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却很差。他们认为研究民国史应该包括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这很有道理。为此，我建议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室增设一台湾研究组，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以便今后能通过学术研究，经由美国和香港向台湾做工作。

我们在美国时间很短，所到的地方和接触的人又很多，因此了解到的情况是很表面的。仅写出一些观感供参考，错误之处望予指正！

从宗教的窗口看美国

赵 复 三

在三十小时里，喷气客机把我们载入不同历史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另一个世界。“文化冲击”带来千万个新鲜的感受，迫使人不断思索一个问题：究竟怎样来认识一个陌生的社会？五年前，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偕两位同事访问中国后，写了一本日记《中国之行》。加尔布雷斯在他的书中提出，分析任何经济制度，要看它如何回答下列问题：推动人们劳动的动力是什么？人们的劳动产品是什么？人们的劳动组织是怎样的？生产的领导与计划由何而来？为谁的利益？取得多大的成效？这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思考方法。从我们来说，我想，认识一个社会，是要从它的经济活动入手，加尔布雷斯提出的问题都有助于认识一个社会，但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看这个社会所产生的人怎么样？认识美国，不仅要看今天美国的物质产品，更要看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着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要看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在美国，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制度“模压”出来的人，另一方面也有抵制、反抗这种“模压”的人民大众，也需要去认识。在这过程中，很自然地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去和美国比较，在比较中认识美国，也认识我们自己。尽管有这样的主观愿望，却不是“喷气客机上观花”所能做到的，只能算是从片断感受中引起思索的一些问题吧！

“富裕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是什么

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产品的确十分丰富。百货公司、商场、商店里，各种食品、日用消费品，种类非常多，价格比西欧、日本便宜。一般人衣著并不讲求（政府和企业的职员除外），但是食、住、行的水平都相当高，私人小汽车据说比三十年前普遍得多。在波士顿访问一个华侨成衣女工的家庭，她只能拿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二点六五美元，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月拿工资四百多元，住房两间，三十多平方米，家具不多，但有煤气、暖气、电冰箱，每月房租水电费一百六十余元，三口人伙食费约二百余元。她认为生活还可以过得去。这大概属于兰领工人中工资和生活水平都较低的人家。

从表面上看，美国穷人似乎不多。按照美国政府标准，四口之家，每年收入在五千美元以下的，划为贫穷户。政府承认，全国贫穷户、营养不良户占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美国朋友则认为，实际不止此数。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在亚利桑那州，由墨西哥流入的季节性农业工人，每小时工资只有一美元（白人从事同样工作，每小时工资三点二五美元），晚间就睡在田里，用塑料薄膜口袋盖在身上遮挡露水。在一些大城市里，都有贫民窟；甚至在闹市区，也能看到有些无业游民，白天游荡，晚间到垃圾桶里拾破烂。有的黑人，晚间站在街角上，拉奏乐器，向行人乞讨。他们被中上层社会蔑视地称作“垃圾”（Trash）。

在今天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还有贫穷现象，本来不足为奇。在我们国家里，贫穷户远比美国多，城市一般居民的居住情况比美国也远不如。但是，问题在于：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失业、贫穷问题？在美国，实际是把一部分人民的贫穷、失业看作是必

须要有的劳动后备军，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现象。曾在肯尼迪时期任总统经济顾问、一九七一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被认为是美国经济学权威之一的詹姆士·托宾在鼓吹政府确立充分就业目标时，就把维持百分之四的失业水平包括在政策之内。以八千万就业人口计算，就是三百二十万，每个失业工人如果按美国标准的四口之家计算，就影响将近一千三百万人。而这次我们访问白宫时，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舒尔兹承认，事实上失业率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就是说，至少有一千九百万至两千五百万人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在美国两次遇到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贝拉认为，这部分贫困户的存在就使广大劳动群众感到，自己千万不要掉到贫困的深渊中去，要在生存竞争中拼命抢到前面去。对资本家来说，保持几百万人口的失业大军队伍，保持这样一种失业的精神威胁，就使他们在驱赶劳动人民或对付有组织的工会时多一种武器。因此，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处于贫困，是美国“富裕社会”得以存在的“一条腿”。

美国“富裕社会”得以存在还有另一条腿，就是：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大量生产，并且鼓励大量浪费。浪费成为美国经济生活的特征。资本家在制造日用消费品时，并不希望它经久耐用。新建的摩天楼，玻璃窗都不能开，全靠电力空气调节器。妇女服装、小汽车式样，一年一变。一位教授的夫人说，去年做的衣服，今年就不能再穿了，因为式样变了，再穿被人笑话。旧汽车成堆、最后压成废铁块处理掉。总之，这个经济制度需要人们浪费才能维持它运转，维持资本家的高额利润。

按今日的世界标准说，美国是可以算作富裕社会，但是，是否可以说，它是建立在一方面大量浪费、一方面又有部分人陷于贫穷这个矛盾的基础之上的。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天生成的，不可

能解决，也不打算根本解决的矛盾。

美国人非常珍惜“自由”，人们从少年时代就被教育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凡我愿意做的，我都可以做”。的确，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寻找、调换职业，可是，任何机关、学校、企业也可以自由解雇它的雇员。我们接触的人中，多半是大学教授。按理说，做到大学教授，生活该有保障了。其实不然。陪同我们代表团当中文翻译的一位马里兰州立大学华人助教，有一次感叹地说：“你们可不知道在美国失业的滋味。我曾经失业过两个月。一失业，就一切都完了，好像被扔到社会外面去了，更不用说经济上的困难了。”年轻的助理教授、付教授，还没有得到长期聘约，不知道明年是否还能接到聘书，因此，要拼命写书，证明自己的才能。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的雇员都要想法保住饭碗。文科教授也不例外。年轻些的，失业后还比较容易找到职业，中年以上的，尤其是妇女，要找职业就困难得多。失业和贫困就像无形的皮鞭，威胁着人们，要他们为自己的生存而去竞争，为资本家生产更多利润，使资本统治更稳定。如果竞争不过别人，便被无情淘汰。这就是加尔布雷斯所说的“劳动的动力”。这种精神上时时刻刻的威胁和鞭答，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个人自由”。透过富裕的物质产品去探索一下这个社会的基础和生产劳动的动力，就比较容易懂得，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尽管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却并不感到幸福。

人的商品化和生物化

美国联邦政府卫生教育福利部下属的教育局曾编印一本小书《独立宣言和它的故事》，书中第三十页上写道：“人们生来平等，他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在美国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人

都能感到，金钱就是上帝。惟有在金钱面前，人人才是平等的。谁有钱，谁就神气；谁穷，谁就被看作“垃圾”。

在哈佛大学和一位经济学教授谈天，谈到各科教授的待遇。他说，医科教授待遇最高，其次是工科、其次是法科、再等而下之是理科、社会科学各系，待遇最低的是人文学（文、史、哲、心理等）。问他，这个待遇的等级是谁规定的？他说：“这是市场供需规律决定的。”我不理解。他就解释给我听：“医生自己开业收费很高，能赚许多钱。医学院若不出高薪，就请不来教授。工程师可以到工厂去，律师可以进法律事务所，都能赚不少钱，因此工学院、法学院也必须出高薪聘教授。等而下之，文学、哲学最不能到社会上赚钱，因此人文学教授待遇也最低。”在资本主义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供需规律是一条基本规律。在社会上，知识也是一种商品，人们买这种商品，是为了转卖时能换取更大利润。教授的知识，能不能使学生将来博得最大利润，就决定了教授自身的价格。当这位教授讲到他的待遇是由市场供需规律决定时，他完全清楚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商品。虽然他谈话的声音是平静的，可是却使人深深感到他那极力压抑的内心痛苦。人竟然沦为商品，被分等论价，被无情的市场需要所播弄，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普遍的、无可抗拒的命运。这种辛酸的滋味，我们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几乎已经忘记了，而年轻些的同志则恐怕是很难想像得到的。

人们既被迫把自己作为商品去出卖，换得的也是商品。在商业化的社会里，人的价值也变成要用做生意来衡量。看他做生意的本领有多大。我曾经问一位教授，美国最普通的一般人，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回答说：“取得成功”。后来又问陪同我们的一位美国朋友，美国一般人心目中的“个人成功”，包括什么内容。他回答说：“第一，赚钱多、费劲少的职业；第二，职位不断提升，

而且出名，第三，能买漂亮住宅，常换新汽车。”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只是个人的名利、地位、享受，那么他的存在对社会还有什么价值？一种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生，对个人来说，能从中感到生活的意义吗？这个问题在噬咬着广大美国人民的心灵。好几次，我都听到不同的教授们异口同声告诉我：不少人精神苦闷，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在波士顿，与一位旅居美国四十年的华人电子计算机专家，在他家豪华的客厅里，一边喝着放了冰的淡酒，一边讨论美国人的生哲学。他毫无表情地凝望着沙发前的红木圆几，冷静地说：“在美国，人们对别人很友善，这是必要的处世之道。在心底里却认为，人人都是坏蛋，你我也一样。谁都想偷税漏税、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为此，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做。既然人人都如此，与其等别人来吃我，不如我先吃掉别人。”这是在美国商业社会中经历四十年酸辛后的坦率体会。坦率得使人愕然。联想到哈佛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在前几年发表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科学》一书，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提高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宣称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有生物学的基础，来自要求生存和繁殖的本能。一个人帮助别人是为得到报答，善行也是为了自我利益，甚至母爱也只是一种遗传上的投资政策。生命的本质就是冲突，因此每个人都天生有侵犯别人的本性。这种“人对人像豺狼”，鼓励人发展兽性的理论，却被称为是“新的综合科学”，不由得令人吃惊。但在此以后，当一再听到美国朋友说起不少人感到孤独时，倒觉得似有所悟了。

“价值危机”

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感到孤独，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本来是寻常事，因此，人们要到宗教里去寻求安慰。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科学发达，却还有很多人相信各种各样的宗教，其真正的原因也在于此。而在这十几年里，美国侵略越南战争遭到国内外人民的反对，最后失败。这一段历史使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经历了极大的震撼，原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危机更加深化了。青年由反对侵越战争，发展到反对美国传统的文化伦理道德。他们觉得国家欺骗了他们，“水门事件”暴露出尼克松的道德破产。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使他们感到前途渺茫、令人恐惧。传统的宗教伦理道德说教，对不少人来说已经失掉魅力，已经破灭。这样，生活中的孤独、无意义就更加突出。不少人对社会极端悲观，无论对国家、民族、家庭、道德、宗教都抱虚无主义态度，否定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这种思想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相当流行，被称作“反文化运动”。它得不到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能够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却在垄断资产阶级的鼓动纵容下，被引导到吃“迷幻药”和性的极度放纵这条堕落的道路上去。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当年的“反文化运动”逐渐取得社会公认的地位。美国自立国以来，标榜基督教清教徒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都在动摇，形成今日美国思想界普遍谈论的所谓“价值危机”。知识界在艰难地重新寻找精神的出路。物质富裕填补不了精神的贫困。经济学家们研究今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如果把贫困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则今日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精神文化上倒可以说是绝对贫困化。

传统教会的没落与新教派的兴起

在这场精神危机中，群众的精神苦闷比以前更深。美国社会

历来靠基督教赋与社会和人生以意义、目标、应许和希望。现在，传统的基督教会组织也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不再能维系人心。因此，在基督教内部，宣扬天地末日将临、个人重生得救、煽动宗教狂热的奋兴派逐渐压过宣讲伦理道德、先改变人心再改造社会、祈求“天国降临人间”的传统“主流派”教会。

根据一九七三年美国宗教团体的统计，美国共有三十二万九千六百七十二个教会，在约两亿一千万人口中，基督徒人数据称有一亿一千万。其中新教徒约五千五百万，天主教徒约四千八百万，犹太教徒约六百万。近十余年来，随着传统基督教文明的衰颓，在基督教内部，主流派教会（包括卫理公会、长老会、圣公会、公理会等）不再能象过去那样影响广大人民，但是还有不少人向宗教寻求精神安慰，因而奋兴派的教会（如南浸礼会、神召会、耶和华见证会、安息日会、五旬节教派、摩门教派等）很活跃。从基督教的社会思潮看，在国内问题上，似乎在由改良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在国际问题上则五十年代以前的世界主义思潮逐渐有气无力，孤立主义思潮（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大讲和平、支持对苏缓和）似在抬头。这种思潮变化可能与基督教奋兴派的活跃及支持它的南部权势集团有关。

近二十年来，美国南部权势集团兴起。美国南部也正是基督教各奋兴派团体如万国基督教联合会（主持人卡尔·麦金泰，总部现设佛罗里达州加纳维拉尔角）、“大学十字军运动”（主持人威廉·布赖特，总部设立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基督教反共十字军”（主持人弗雷德·施瓦茨，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长滩）等组织的根据地。这些团体在政治态度上，素来反苏也反华，近两年来公开反华的言论似乎有些收敛，有些传教组织负责人来中国旅行后，也承认中国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但根本目标还是想恢复对中国的传教活动，用基督教“征服”中国。

近年来,美国基督教没落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少青年在寻求宗教安慰时,转向佛教,印度教,道教等,产生了“超越冥想”、“世界统一神灵教会”(与南朝鲜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南朝鲜在美富商文鲜明创立)、“人民圣殿”教等许多新兴教派,在宗教上,出现了“多元主义”。其中,练习瑜珈的,据一位学者说,有六百万人。翻阅一些新兴教派的刊物,对美国社会问题有不少揭露。这些新兴教派使人深深感到,它们是对社会现实苦难的“抗议”(甚至不惜以自杀来抗议),但这一切终究不过是“呻吟”和“叹息”。它也反映了美国传统宗教—基督教—的危机,反映出传统的社会上层建筑已经不足以维护它的经济基础了。

和宗教上的变化相应,宗教研究也有显著变化。过去,美国的宗教研究向来是以基督教自由派神学院为中心,以基督教作为宗教研究中的主体。十余年来,基督教主流派教会的地位开始动摇,垄断资本家的宗教投资转向奋兴派,神学院经费日见拮据,请不起名牌教授。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宗教研究中心逐渐由神学院转向一般大学。十余年来,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几乎都开设宗教课程,许多大学成立宗教系。像耶鲁、哈佛等大学,神学院与大学宗教系并立。在大学里,宗教研究与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并列,而且往往与世界各地区的研究结合起来,信仰主义色彩逐渐冲淡,变成一门世俗的人文学科。在方法上逐渐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去研究宗教;而神学院则逐渐萎缩,成为训练教会牧师的场所。现在美国的宗教研究基本上是说明宗教这个社会现象的一门学问;或者用宗教理论来为现实社会作注解,对美国现实社会,给予“道德上的核准”,如谈论什么“同性恋的合理性”。许多大学的宗教研究甚至不包括伦理道德。宗教哲学也很薄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杜维明教授认为,美国近年来学院哲学脱离现实社会,多半钻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分析

学。此外，神学院则转向传道人员的职业训练，大学的宗教研究注重社会学、历史学角度的研究。这些因素造成宗教哲学的冷落。

本来美国哲学界从威廉·詹姆士起，对宗教经验、宗教心理学向来重视研究。而现在对宗教心理学也不重视（苏联东欧研究宗教的学者对宗教心理学颇为重视）。对此，有的美国学者解释，现在美国心理学界还深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弗洛伊德把文化、宗教都看成是人的性冲动压抑升华后的矫揉造作，持基本否定态度。心理学界另一种倾向是注重生理学研究。因此，目前在宗教研究中，宗教心理学也不被重视。

关于当前美国的新兴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英国籍女教授开设了课程。其他各大学里，谈论新兴宗教的人很多，真正有研究的学者还不太多。

目前，美国对世界各大宗教的研究，总的说来，基督教是传统的重点，其次是佛教，道教，近年来较受重视，其次犹太教，印度教。至于伊斯兰教研究，目前似没有什么开展。过去，美国哈特福神学院专门研究伊斯兰教，现在研究力量已并入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一些老教授感叹，近年来，学术水平降低。这恐怕也是美国资本主义陷于没落的一种反映。

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在美国的短暂访问，一方面看到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却的确看到它的文化正在没落。过去读古罗马史，公元一、二世纪，罗马帝国在经济上还比较稳定，甚至有所发展，但是政治思想上、道德上却已经开始瓦解，这两方面怎样统一起来，总是体会不深。在美国一个月，不时想到古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览今思古，以前不曾弄懂的罗马帝国晚期历史，现

在似乎看清楚一点，今日美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从历史对照中也能得到一点启发。公元一、二世纪，在罗马帝国也是各种东方宗教、新教派大批兴起，和今日美国新教派蜂起相对照，似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现实。

在美国，有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文化。美国资本主义是在没落，但美国人民确实是积极进取、朝气蓬勃的人民。在每个城市，无论早晨、中午、傍晚，总可以看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跑步。后来看到材料说：美国有九千万成年人参加各种运动，超过人口半数以上。中年以上的男男女女还不服老。有的中年以上妇女，把子女抚养大了以后，又重新回大学继续读书，有的老太太“皓首穷经”，读博士学位；有的城市里，成年业余教育有很多人参加。这种学习精神十分感人。

美国人民的朝气还表现在另一点，就是普遍重视体力劳动，到处可以听到一句话：“自己动手干”（Do It Yourself）。许多人家日常生活所需的电工、木工、金工工具一应俱全，汽车房就是个劳动车间，甚至刷房、除草等等，样样自己动手干，即便有些家中很富裕的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文明也有它的两重性，它讲求实际，为了竞争必须要有高效率。在美国到处感觉到有一种务实精神，对于现实的困难，他们不遮遮掩掩，每做一件事都认真、仔细抓到底，决不含含糊糊、半途而废。美国人做事喜欢讲“成本与效益”，讲效率，做一件事要付出多少代价，能从中得到多少效益，要把它算个清楚，要快出成果。

大概也是和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背景有关，美国一般人法治观念强，正因此，连尼克松也可以撵下台。日常生活中，执法是严格的：工厂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就必须停工，公路上汽车超过规定速度就罚款，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也要罚款，人们过

马路都习惯地自觉服从自动红绿灯指挥。这些地方都反映出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任何民族，有积极进取，讲求实际，注重劳动，尊重法制的传统，这样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想到美国的人民，就使人不由得充满亲切的感情，寄予无限的希望。在洛杉矶时，和两位美国朋友谈心。这一对夫妇对今日美国流行的社会风尚痛心疾首，为他们的子女教育忧心忡忡。同时，他们也讲到，现在有一些人，结合在一起，离开大城市，到农村中过简朴的集体生活，在美国许多州里都有。这使人联想到上一世纪罗伯特·欧文在新大陆曾经建立过的空想社会主义殖民团体；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詹姆斯·佩恩、亨利·梭罗；联想到华尔特·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西奥多·德莱赛、菲利浦·波诺斯基、麦可·哥尔德等许多优秀的诗人、作家；联想到由欧洲移居美国的工人运动先进人物、后来的美国劳动骑士团和劳工运动中许多优秀人物。美国人民有自己优秀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它始终在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带来的污泥浊水斗争着。在波士顿，一位有才华的中国作家讲到，在今日美国，特别在青年中间，有一股潜流，被称为“潜文化运动”。可惜没有机会多去接触。它将如何发展，现在还看不清楚。但是，可以深信，资本主义的污泥浊水，终将被人民冲刷掉。美国人民将象美国国徽中的雄鹰一样，在困难的斗争中，创造出新的、光辉的文化。展望未来，我们对美国人民抱着衷心的祝愿，寄予无限的希望。

美国的语言学研究

廖秋忠

这次前往美国访问，在专业方面比较着重两点：一是，实地了解一下沿途上各大学的语言学系，看看在语言学人材训练这方面美国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值得借镜的地方；二是，了解各地师资的阵容和特长，为本院语言所和民族所将来派人前往美国深造找地方。在沿途上结交了一批新的朋友，顺道探望了一些老的朋友和师长，为中美两国在语言学交流做了一些铺路工作。关于美国语言学的动态，请参看今年四月份《语言学动态》一至十一页拙作《美国语言学研究情况介绍》。

在这次访问里，先后接触到应用语言学中心，乔治城大学中文组，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系，耶鲁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哈斯金斯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和语言学系，哈佛大学语言学系，密歇根大学语言学系和东方语文学系，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柏克利加州大学语言学系，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和东方语文学系的部分负责人、教授和研究生。此外，在华盛顿的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上，还碰到了美国语言学会的三位代表，分别来自奥斯丁德州大学，印地安那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由于美国语言学的理论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各个大学语言学系师资的背景和系的传统决定了各系的特色，但在训练的方式上和对学生的要求上却是大同小异。

美国各大学的语言学系是培养语言学专业人才的中心。现在的大学教授和许多研究人员都需具备有博士学位，因此以培养大学师资和较高级研究人员为主的系并不重视硕士这个学位。学生的学习年限一般都有上限和下限的规定，但这个限度很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专业学习的进度，在不同的时间内完成学位。一般地说，念完硕士需二年左右，博士需四至六年。今后我们研究生的修业年限，应考虑各种研究工作对于专业要求的不同和每个学生进度的差异而有较大的伸缩性。

由于美国大学对于大学生重视通材教育，重视基础训练，不求有深度的钻研，因此大学毕业生在进入研究院时在专业方面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加上语言学的部分研究和物理学、生理学、数学、逻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电子计算机学和语文等专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语言学系的研究生除了少部分是语言学系的大学毕业生之外，大多数来自上述各科系。来自各学科的研究生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带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为语言学提供新的方法和看法，促进了语言学在过去二十多年在许多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带回给原来的学科，使原有学科也得到了丰富。跨学科的研究打破了旧有的学科分界，有利于知识的互相沟通，有利于多方面去认识问题，同心协力去解决问题。今后我们如能将和语言学研究有关的大学毕业生吸收多一些人为研究生，应可以避免思想僵化，钻入牛角尖，会有助于我们推动在许多方面我们仍处于空白状态的研究。

即使在语言学系的博士班研究生的训练，还是要求广度和深度并重。研究生入学之后要先掌握语言学所有领域一般性的知识，然后选择某一领域为主修科目，某一领域为副修科目。通常在第一年里以修一般性的基础科目为主，第二年以后逐步修些难度较大的课程，并逐步加强主修科目的课程。学生在决定主修科目之

后就得找定指导教师来指导选课和做研究工作。学生除了通过专业考试之外，还得写一篇论文，并通过口试才能毕业。对于硕士班学生，在广度和深度的要求比博士班松得多，我们的研究生一般性的知识底子薄，在培养时要兼顾广度，将来才有发展的余地；也会有助于学生对于语言学有个比较全面的观点。

学习的方式根据课程的内容而有不同。对于一般性的基础课程采取教授讲课方式；对于难度较大，专业性较强的课程采取讨论班方式进行。采用讨论班的方式学习有助于展开讨论，提倡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风气。我们在培养研究生时应加强这种学习方式的推广。

对于研究院的学生，除了专业之外，对外语也有一定的要求。一般的要求是能阅读两种用外语写的专业性论文，同时要求对于非印欧语系的一种语言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今后对于想进入语言学的研究生，应鼓励他们在大学时就学好一门外语，在进了研究生院时应鼓励他们对我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美国的研究中心在各个大学，教授一面做研究一面教学。教研结合得很好，教学相长取得很好的结果，虽然教授占研究生的便宜到处可见。今天我们大学师资普遍不足，如何充分利用各研究所的人力来培养下一代的研究人员将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美国语言学研究生训练最大的缺点根源于实用主义的泛滥。就业的需要和财源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课题，需要长时期研究的课题也常因为讲求迅速收效和财源问题而没有人愿意去做。

由于文革以来我国语言学的研究遭到很大的破坏，培养年轻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和提高现有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是两件极其

重要的工作。研究生主要还是要依靠现有人力来训练。限于目前我们语言学人力不足，有些研究工作还很落后，我们有必要送些人出国学习，并找些人前来我国讲授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特别是普通语言学理论和电子计算机应用于语言学的研究。关于送人出国学习，特别是美国，只要我们准备工作做好了，问题不大。请人进来应是比较经济实惠。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请人进来以举办讲习班最为合适。初步的构想是，每年暑假邀请三个左右的外国学者讲授几个语言学中的不同领域，将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工作者当中具有潜力，急需进修者集中起来给予六至十个星期的短期训练，经过两、三年之后，他们的业务水平必然可以提高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暑期班在两、三年后可以由国内师资逐步取代。举办暑期班比较容易请人来，也容易把国内的专业工作者集中起来，集中比分头搞省钱、省力很多。

我国语言多，方言更多。这是个有利于语言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今后我们应加紧对新血液的培养，努力提高现有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把我国发展为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中心，使汉藏语系的语言在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时我们也应鼓励外语系的师生展开对于外国语言的研究，这将有助于外语教学，会有助于我国语言学的全面发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访美观感

SS号=10477434